

## 「兩廣事變」中 蔣中正對兩廣的和戰態度

王宏松

### 摘 要

當國民政府的統治力量，擴張到全國大多數地區時，兩廣卻仍然以「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執行委員會」等組織，以「均權分治」為號召，對南京中央維持著半獨立狀態。到了1936年，寧粵長期的對峙關係出現了激烈的變化。首先是粵漢鐵路即將接通，這對中央勢力進入廣東提供莫大的便利。其次是胡漢民突然因腦溢血逝世，這使得兩廣失去了重要的政治支柱。粵桂實力派領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以西南政務委員會及西南執行部名義，打著反對日本增兵華北，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的旗號，是為「兩廣事變」，或稱「六一事變」。

本文以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為基礎，其內容有「事略稿本」、「革命文獻——兩廣事變」、「特交文卷」等，輔以國史館新出版的《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近史所出版的《王子壯先生日記》等，希望對兩廣事變中蔣中正對兩廣的和戰態度有進一步的認識。本文擬分析兩廣事變之初，蔣中正對粵桂的不同處理方針，其次論述在陳濟棠的勢力瓦解後，蔣氏為何對桂系的態度丕變。最後討論兩廣事變和平落幕的原因，蔣與桂系雙方各有何考量因素。事變最終和平落幕，對蔣中正而言，應付國內實力派的挑戰是先作好軍事準備，但不輕易發動戰爭，同時對外塑造有誠意談和的形象，以贏得輿論的好評，這代表其統治手腕已更加成熟。

關鍵詞：蔣中正、粵系、桂系、兩廣事變

# Exploring Chiang Kai-shek's Attitude toward the Guangdong-Guangxi Clique during the Guangdong-Guangxi Incident

Horng-Song Wang<sup>\*</sup>

## Abstract

Whe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Kuomin Government) controlled most of the territory in China,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with the appeal for sharing power between separated governments, still maintained quasi-independence from the Nanjing Central Government by organizing the Southwestern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Southwestern Political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1936, the long-standing standoff between the Nanjing Government and the Southwestern National Government showed a dramatic change. Firstly, the Yuehan railway was set to go into operation, which would greatly benefi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entering Guangdong. Secondly, Hu Hanmin's sudden death of cerebral haemorrhage deprived Guangdong and Guangxi of their important political patron. The powerful leaders of the Guangdong and Guangxi Clique, including Chen Jitang, Li Zongren and Bai Chongxi, opposed Japan to increase military forces in the North of China and used this issue as a pretext to urge the government to fight against Japan immediately. It was called the "Guangdong-Guangxi Incident" or the "June 1 Incident."

The research drew reference mainly from the Chiang Kai-shek Collections and was supplemented with the Memoirs of Chen Cheng: the North Expedition and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the Chen Cheng Correspondence Collection : with Family newly published by the Academia Historica and the Diary of Wang

---

<sup>\*</sup>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zu-chuang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his research hopes to gain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ang Kai-shek's attitude toward the Guangdong and Guangxi Clique during the Guangdong-Guangxi Incident. The research tried to analyze different policies Chiang Kai-shek adopted towards Guangdong and Guangxi respective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ncident. And then the research explained why Chiang changed his attitude toward the Guangxi Clique dramatically after Chen Jitang's power collapsed. Finally, the research discussed what Chiang and the Guangxi Clique had in mind to end the Guangdong-Guangxi Incident peacefully. The peaceful ending of the incident meant that Chiang Kai-shek was prepared for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powerful domestic warlords while maintaining not to launch wars easily. He established the image of being willing to negotiate for peace and was embraced by good public opinion. This was a sign that he was getting more proficient in political maneuvering.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the Guangdong Clique, the Guangxi Clique, the Guangdong-Guangxi Incident**



# 「兩廣事變」中 蔣中正對兩廣的和戰態度\*

王宏松\*\*

## 壹、前言

當國民政府的統治力量，擴張到全國大多數地區時，兩廣卻仍然以「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執行委員會」等組織，以「均權分治」為號召，對南京中央維持著半獨立狀態。南京方面則因內外多故，加以統治力量尚未到達該地區，對於此種狀態姑予其存在，使彼此在表面上形成和平共處的關係。不過在閩變平定後，中央軍事力量進入福建；是年底，剿共軍沿著桂、滇、黔、川各省邊區地帶，追剿截堵自江西突圍西竄的共軍，中央軍事力量進入湖南、雲南、貴州，四川等省，對兩廣形成一個大的包圍圈，遂使此一地區與南京方面的關係趨於緊張。<sup>1</sup>

終於到了 1936 年，寧粵長期的對峙關係出現了激烈的變化。首先是粵漢鐵路即將接通，這對中央勢力進入廣東提供莫大的便利。其次是胡漢民自歐洲返國，5 月 12 日在廣州突然因腦溢血逝世，這使得兩廣失去了重要的政治支柱。以往藉著胡漢民的名義為號召，開府西南，尚能與南京抗衡。如今胡氏已死，給了南京蔣中正統一兩廣的機會。因此，兩廣決定反抗南京中央，粵桂實力派領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以西南政務委員會及西南執行部名義，打著反對日本增兵華北，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的旗號。是年 6 月 1 日，西南兩機關集會，議決籲請國民黨中央及政府領導抗日。2 日，又以同樣內容通電全

---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0 年 8 月 17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 年 12 月 14 日。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sup>1</sup>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史館，1995 年 6 月），頁 399。

國。4日，陳、李、白聯名通電響應，並請西南兩機關改頒軍號，准其北上抗日。是為「兩廣事變」，或稱「六一事變」。

兩廣事變的發生，無疑是南京中央「統一化」的作為，刺激了地方實力派危機意識的結果。兩廣舉兵北指，高唱抗日，並非是因為不知中央有抗日的決心和準備。但其借助一般不知內情者對抗日的渴望，提出「忍必有期」的問題為難中央，宣稱要立即北上抗日。因此，兩廣的軍事異動作為，當然被中央目為發動「事變」。

以往有關「兩廣事變」事件的研究，大都僅能依賴相關人物的回憶錄，因缺乏原始檔案資料的佐證，對於蔣中正正在事變中的態度，欠缺具體的探討。在相關著作中，Diana Lary認為桂系利用胡漢民去世所激起的反蔣抗日高潮，發動號召抗日的兩廣事變，而事變的解決是桂系意識到日本的威嚇和中國必須要統一，因而與南京和解。<sup>2</sup>施家順認為兩廣事變是由陳濟棠、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起發動，以抗日為手段來對抗蔣中正的兼併，在陳濟棠垮臺後，桂系決定以持久戰方式對付中央。<sup>3</sup>其他研究較多的是從兩廣的角度來解讀兩廣事變，<sup>4</sup>對於蔣中正的態度雖有學者提及，但深度廣度仍有不足之處。<sup>5</sup>

本文以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為基礎，其內容有「事略稿本」、「革命文獻——兩廣事變」、「特交文卷」等，其中以事略稿本最為重要，因其

<sup>2</sup> 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97-199.

<sup>3</sup> 施家順，《兩廣事變之研究》（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年），頁50-51、72。

<sup>4</sup> 其他較新的研究有徐江虹，〈新桂系與兩廣事變〉，《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31卷第5期（2004年5月），頁63-67。徐文的論點以馬克思主義史學出發，認為兩廣事變的發展不脫歷史的「規律性」。

<sup>5</sup> 陳存恭認為蔣中正對兩廣是絕不驚惶，處以鎮靜，堅持政治解決，貫徹和平統一的政策。陳氏觀點對蔣的態度持如此正面的看法，有其歷史時空背景。見陳存恭，〈從「兩廣事變」的和平解決探討「安內攘外」政策〉，收入《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頁435-478；劉維開認為蔣中正對桂系的態度以和平為方針。見劉維開，〈地方政權的最後反抗——兩廣事變〉，收入《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頁399-416；對蔣的態度較新的研究是呂芳上的論文，以蔣中正日記來看他的內心想法，不過其文的重點不在兩廣事變，故對事變未完整探討。見呂芳上，〈領導者心路歷程的探索：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收入《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82-83。

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來瞭解蔣氏日常的電文、生活作息、每日計畫，及內心想法，其他輔以國史館新出版的《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近史所出版的《王子壯先生日記》<sup>6</sup>，相關人士回憶錄及文史資料選輯等，希望對兩廣事變中蔣中正對兩廣的和戰態度有進一步的認識。事變之初，蔣中正對粵桂的處理方針是否有所不同？在廣東陳濟棠的勢力瓦解後，蔣氏為何對桂系的態度丕變？在和與戰之間，蔣究竟打的是什麼算盤？事件的落幕是因為蔣的忍讓為國，抑是以戰逼和的策略收到效果？以上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本文希望透過兩廣事變，來探查蔣對粵桂和戰態度的變化，進而從蔣的角度來思考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 貳、定粵先於安桂

兩廣事變的發生，其實還是過去寧粵政爭的延續。九一八事變後，粵方在「團結禦侮」的號召下，雖然撤銷了廣州國民政府，但為防止蔣中正復出後打擊報復，仍以「均權分治」的名義，成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維持先前半獨立狀態。因此兩廣成為各省與南京對抗的西南政治中心。對蔣而言，其自九一八事變以後，確實沒有再對國民黨內的反蔣勢力動武，除了對中共和閩變這種公開的分裂政權以外，一般多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然對兩廣言，地盤和實力是保持其身分地位的法寶，不論對外抗日或對內剿共，均不能損及法寶。是以中央全力在閩贛剿共，而兩廣往往在取得中央物資和贏得民眾政治資源後，或與共軍協議，讓其道而行，或者虛張聲勢，只是坐山觀虎鬥。南京中央對此一狀況，由於外患頻仍，能力有限，也無可奈何，所以雙方暫時相安無事。然情勢到了 1935 年初，有了明顯的轉變。<sup>7</sup>

<sup>6</sup> 王子壯當時任職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抗戰前有關黨政問題，包括地方軍人異動，黨內蔣胡派系、山東黨務等，不論親自與聞或品評之辭，均是過去難能獲知的資料。王子壯雖非國民黨的達官貴人，但因長時期人在中央，或與聞中央黨政事務，或親與其事，其《日記》所反應的不只是黨員對時局的記錄，更是知識分子對時代的觀察。王子壯，《王子壯日記》（第一冊：民國 10-12 年，22 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頁 1-3。而本文主要談的是地方軍人的異動，故多處引用其日記，以呈現南京國民黨員及知識分子對兩廣事變的看法。

<sup>7</sup>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從九一八至七七》（臺北：國史館，2000 年），頁 228-230。

因在閩變平定後，南京的力量進入福建，這使得蔣中正與粵桂的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對蔣中正而言，原本對粵系採取的策略是聯合陳濟棠打擊陳銘樞，如今閩變已平定，陳濟棠的重要性不如以往，同時中央的勢力進入福建，下一個目標就是對準廣東。而對陳濟棠來說，中央軍進入福建，這使得廣東東邊的門戶大開，迫使陳氏必須加強擴充海空軍，防堵中央軍入粵，力圖保持偏安局面。與此同時，第五次圍剿終於有了重大的成果，國軍成功收復閩贛地區。但在共軍突圍西走，實力仍不可小覷的情況下，蔣決定繼續派兵追剿中共，這也意味著中央勢力開始進入西南。<sup>8</sup> 蔣有意趁機收復粵、桂、川、滇、黔等省軍政，完成國家統一。<sup>9</sup>

從《事略稿本》的記載可見蔣從1936年開始對統一兩廣的態度漸趨積極。如2月13日，蔣考慮「應注意各項：一、粵漢通車後之局勢。二、兩廣未統一，何以對外。」<sup>10</sup> 2月15日，蔣自記「如何統制兩廣（終久必為後患）」。<sup>11</sup> 因為粵漢鐵路即將接通，提供了南京中央進入廣東的窗口，蔣積極思考如何統一兩廣。同時蔣得知陳濟棠和胡漢民正在明爭暗鬥，一方面蔣考慮支持陳濟棠，甚至委以粵閩國防區軍事指揮之權，<sup>12</sup> 另一方面蔣又設法和胡漢民、鄒魯等人合作，可見蔣並未預設立場支持哪一邊，一切以統一兩廣為目標，屆時視情勢發展再作決定。且中國必須加強國內統一，才有實力對抗日

<sup>8</sup> 王宏松，〈蔣中正與粵系二陳（陳銘樞、陳濟棠）關係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284-286。

<sup>9</sup> 關於追剿期間中央改組貴州軍政情況，請參見楊維真，〈剿共與統一——論1935年中央改組貴州省政府事件〉，「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臺北：圓山大飯店，2001年10月7-9日。

<sup>10</sup> 《事略稿本》（1936年2月13日），〈文物圖書〉，《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檔》），國史館藏。（以下簡稱《事略稿本》）。

<sup>11</sup> 《事略稿本》，1936年2月15日。其它相關的記載尚有，2月17日蔣考慮兩廣事曰：「胡漢民如入京，則兩廣當不再用武力為主，一俟共匪肅清，與粵漢通車則統一成矣，不論何種外患，吾中華有力抵抗，復何憂哉」，見《事略稿本》，1936年2月17日。

<sup>12</sup> 《事略稿本》記載，蔣「電廣州陳維周，告以儉電誦悉，閩省國防，既歸伯南兄負責，則中央駐閩部隊自當由伯南兄指揮，將來粵閩名義發表時，由中央派一副手，協助閩事，並望粵中能派隊接防閩西各屬也，至於如何佈防一節，悉由伯南兄負責處理，望其擬定具體計劃電告，一俟計劃核定，即派蔣銘三或其參謀長來粵面商防務。總之，南方國防關係重大，吾輩謀國，凡事以預為妙。」由上可見蔣預定授予陳濟棠粵閩軍事指揮之權。參見《事略稿本》，1936年5月1日。

本。<sup>13</sup>

兩廣主要依賴西南政務委員會及西南執行部與中央對抗，並羅致了國民黨元老派胡漢民、蕭佛成、唐紹儀等人以壯聲勢，兩廣的實權人物和在粵的中央委員都是西南兩機關的成員，因為兩機關可以在黨政上作出決議與南京分庭抗禮，其中胡漢民更是兩機關的招牌人物。

但是胡漢民於 1936 年 5 月 12 日突然因腦溢血去世，這為兩廣政局投下了巨大的變數。蔣自記道：「胡死後之粵局，仍以政治方法解決之，而對桂與對鄒（魯）等之方針，須確定。」<sup>14</sup> 5 月 13 日，蔣道：「對粵桂方針，先以政治解決粵局，收鄒聯桂為主旨。」可見在胡漢民去世之後，蔣對粵方針仍以政治解決為主，收服元老派代表鄒魯，並與廣西合作，如此中央將可統一西南。任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王子壯對於胡漢民去世認為「由一般黨員之心理觀察未來之形勢，在政治方面因蔣先生少一硬敵，或兩廣方面較有接近之形勢」<sup>15</sup>，因兩廣以胡漢民為政治上的掩護，如今胡一去世，其與中央的關係將有所變化。蔣的算盤是先聯合廣西，以政治手段解決廣東。

5 月 18 日，國民黨召開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決定派居正、許崇智、孫科、葉楚傖、李文範、傅秉常、褚民誼、朱家驊八委員代表中央前往廣州致祭。<sup>16</sup> 5 月 24 日，中央弔唁八大員抵達廣州，並與西南要人商洽團結問題。<sup>17</sup> 27 日南京電：「某中委云，以國事日亟，全國上下有精誠團結必要，此次乘祭胡之便，由各大員與西南當局作進一步之洽商，頃接居（正）委員等之電告，陳伯南等諸委員意見，完全與中央一致，結果頗為圓滿。」<sup>18</sup> 由此可見，蔣透過中央八大員南下祭胡之時向西南提出團結要求，而具體的要求內容為何呢？根據程思遠的回憶，中央利用弔唁機會向陳濟棠提出五項條件：

<sup>13</sup> 《事略稿本》，1936 年 4 月 21 日，5 月 4、5、11 日。

<sup>14</sup> 《事略稿本》，1936 年 5 月 12 日。

<sup>15</sup>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第 3 冊：民國 25 年），1936 年 5 月 18 日記事，頁 139。

<sup>16</sup> 《事略稿本》，1936 年 5 月 18 日。

<sup>17</sup> 林忠佳等編，《申報廣東資料選輯之十四——1934.1-1937.12》（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96 年），1936 年 5 月 24 日，頁 215。以下簡稱《申報廣東資料選輯之十四》。

<sup>18</sup> 《申報廣東資料選輯之十四》，1936 年 5 月 27 日，頁 216。

一、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取消；二、改組廣東省政府，省主席林雲陔調京任職；三、在西南執行部和政委會工作的負責人，願意到京工作者，中央將妥為安排，願意出國者，將給以旅費；四、陳濟棠的第一集團總司令改為第四路總指揮，各軍師長由軍委會重新任命；五、統一幣制。<sup>19</sup>

南京中央的目的是要在政治、軍事方面統一廣東，要求陳濟棠交出政權和軍權。不過蔣在6月8日中央紀念週對此一消息作出澄清，蔣說道：「此次中央推派八位委員到粵致祭，公私宴會，一概謝絕，更沒有商談黨政問題，不料外面猜測紛紛，竟有什麼向中央向兩廣提出五項條件等等謠言。這種謠言，全無根據。」<sup>20</sup> 蔣否認中央八大員曾向陳濟棠提出五條件說，認為它是日本通訊社所放出的假消息。王子壯的觀察則是「日人所辦之同盟社更述說中央於兩粵邊境布置35萬大軍，於八委赴粵之際提出五項條件，欲使兩廣之財政、軍政等隸屬中央並取消西南政務會及西南執行部等要求，西南被迫不過乃毅然出兵等語，消息傳來至為奇突」，王氏求證於八委員之一的葉楚傖，提到中央對廣東是否有五條件說，葉稱「絕非事實，純為日人之造謠，並謂35萬大軍中央方面亦否認其事」，而王子壯從山東同鄉所得知消息顯示中央並未調派35萬大軍威嚇廣東，最多僅將李玉堂師由福建中部向南移，對廣東加以防備而已。<sup>21</sup> 對照廣東和南京兩造的說法，廣東認為中央利用弔唁機會提出五條件說，而南京嚴詞否認，謂其為日本通訊社的謠言，目的是引發中國的內戰。而從蔣中正1936年初以來的思緒脈絡來判斷，蔣確有統一廣東之意，尤其在粵漢鐵路通車後，中央勢力更易進入廣東，不過蔣自始認為應用政治手段統一廣東，就算胡漢民去世蔣仍作此打算。因此，蔣利用管道向廣東提出加強團結的建議，內容或許不是上述的五條件說，但是要求廣東在政治上改組以服從中央是很有可能的。

在中央提出團結要求後，兩廣領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召開會議，商討如何應付時局。李宗仁、白崇禧主張慎重，但陳濟棠卻要求採取積

<sup>19</sup> 程思遠，《政海密辛》（香港：南粵出版社，1988年），頁87。

<sup>20</sup> 「蔣介石為兩廣擬單獨出兵抗日重申其對日方針的報告」（1936年6月8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第五輯第一編 政治（五）》（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793。

<sup>21</sup>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第三冊：民國25年），1936年6月3日記事，頁155。

極行動。至此，李、白認為粵桂不能各行其是，於是與陳濟棠共同行動。<sup>22</sup> 而李、白向陳濟棠要求財政補助，因為廣西全省財政收入每年只有 2,850 萬元，其中鴉片煙過境稅就占了 1,100 萬元，賭餉<sup>23</sup> 約 400 萬元。如果政局波動，這兩項收入還要大大減少。而支出方面，平時軍費就已達 1,900 萬元，擴充軍隊不知還要增加多少倍。陳濟棠答應支援廣西白銀 400 萬元，廣西準備以這筆現洋作準備金，發行省金庫券 2,000 萬元，作為臨時的財政措施。<sup>24</sup> 而兩廣用什麼名目反蔣呢？想來想去只能用「抗日」這個旗號才好爭取國人的同情。<sup>25</sup> 因為當時日本為了進一步要求華北特殊化，大舉增兵華北，並逼蔣簽訂所謂中日「共同防共協定」，民眾抗日熱潮高漲，陳等認為扛起抗日大纛，或許能暫保西南局面，至少也讓南京出兵名不正，言不順，有所顧慮而卻步。<sup>26</sup> 而南京方面對於粵桂要人集合廣州商議的消息也有所掌握，蔣言道：「李（宗仁）、白（崇禧）皆聚粵會議，對中央之方針，其必謀反抗，而中央不能不預為之備。」<sup>27</sup>

兩廣方面事前作軍事部署，擬定作戰計畫。對福建和貴州方面採取守勢，對江西、湖南方面採取攻勢。西南方面使用的兵力總計：陸軍部隊不下三十多萬人，空軍方面廣東有六個中隊（司令黃光銳），廣西三個中隊（司令林偉成），海軍方面廣東有江防艦艇數十艘（司令張之英）。粵軍主力集中在大庾、韶關地區，準備進攻江西；桂軍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區，準備進攻湖南，並在粵、桂兩省與各鄰省的邊境地區構築了防禦工事。<sup>28</sup>

<sup>22</sup> 程思遠，《政海密辛》，頁 87。另一份材料說是白崇禧怕陳濟棠反蔣不堅決，故意表示不願反蔣。白的說詞激得陳濟棠說：「你不幹，我一人也要幹」。見藍香山，〈我所知桂系「六一」事變〉，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十年內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年），頁 690。

<sup>23</sup> 向賭場抽稅。

<sup>24</sup> 黃啓漢，〈回憶桂系的「六一」事變〉，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十年內戰》，頁 686。

<sup>25</sup> 劉斐，〈兩廣六一事變〉，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 3 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10。

<sup>26</sup> 申曉雲、李靜之著，《李宗仁的一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207。

<sup>27</sup> 《事略稿本》，1936 年 5 月 21 日。

<sup>28</sup> 劉斐，〈兩廣六一事變〉，頁 11-12。

兩廣為了打出抗日的旗號，首先透過西南執行部名義於5月26日發表有電反對日本增兵華北，以激起全國反日情緒。蔣收到後反應為「歎外患內憂之交迫矣」，並自言「對粵桂要領以不減削其胡漢民在時之權利，而為設法解除其所有之困難，則於統一庶乎可矣」。<sup>29</sup> 蔣的處理方針為「對兩廣應沉機靜觀以待其變化」，專注於政治解決。<sup>30</sup> 6月1日，蔣電陳濟棠之兄陳維周道：「政客伎倆惟利是圖，弟所瞭然，吾兄精誠為國，激濁揚清，不為浮言所動，吾人開誠布公，宗旨盡同，無慮中傷。」<sup>31</sup> 不過蔣自言「兩廣謀叛之徵兆已見」。<sup>32</sup>

6月1日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行部正式集會，決議呈請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並通電全國，籲請國民政府領導抗日，並派兵北上。6月2日西南兩機關乃根據此呈文的內容，通電全國，是為「冬電」。4日，西南將領數十人，由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領銜通電響應，並請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執行部改頒軍號，准其北上抗日，是為「支電」；西南兩機關旋即舉行聯席會議，將陳、李、白所部改稱「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令其剋日北上，是為「兩廣事變」或「六一事變」。<sup>33</sup>

兩廣藉抗日問題發起對中央的挑戰，主要是民眾對政府消極對日早已積累了一定程度的不滿。自一二八事變以來，中國的對日外交方針，一直遵行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消極地應付因日本侵略而產生的諸多問題。而在塘沽協定簽定後，國民政府的對日方針易為「困守待援」，主張「除非在最低限度之下，不放棄妥協」。其目的不外是先求國內政局的穩定、統一，以發展國力，俾於日後全力對外。然而，日方卻絲毫沒有因為南京政府的妥協而饜足，隨著南京政府的中央化運動日益取得進展，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廣田三原則」陸續出籠。不過，羽翼漸豐的南京中央也有了改弦更張，重新調整國內外政策的相當條件，並在民國25年有了所謂的「全盤調整中日邦

<sup>29</sup> 《事略稿本》，1936年5月27日。

<sup>30</sup> 《事略稿本》，1936年5月28、30日。

<sup>31</sup> 「蔣委員長致陳維周東電」（1936年6月1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8冊，「兩廣事變」，編號5，《蔣檔》，國史館藏。

<sup>32</sup> 《事略稿本》，1936年6月1日。

<sup>33</sup> 施家順，《陳濟棠與廣東軍政（1928-1936）》（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年），頁131-132；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頁402；劉斐，〈兩廣六一事變〉，頁12。

交」政策。同時，為了加速對日備戰，蔣試圖以政治談判方式解決備受質疑的「內戰」。兩廣事變的發生，無疑是南京中央「統一化」的作為，刺激了地方實力派危機意識的結果。其舉兵北指，高唱抗日，並非是因為不知中央有抗日的決心和準備。但其借助一般不知內情者對抗日的渴望，提出「忍必有期」的問題為難中央，宣稱要立即北上抗日。<sup>34</sup> 因此，兩廣的軍事異動作為，當然被中央目為發動「事變」。

蔣中正收到陳濟棠以西南執行部及政委會名義所發的「冬」、「支」兩電後，蔣研究其內情並考慮處置方針。得到以下幾點：「一、陳濟棠派遣王若周密往北方運動叛變。二、濟棠一面派其兄維周與中央討價講價。三、一面挾廣西以威脅中央，而乃諉罪於廣西。四、濟棠之惟一目的，在求自保，而乃欲謀叛中央竟以推倒中央為其自保之地，而置國家於不顧。五、在我中央，非收復廣東不能統一全國，亦不能鞏固革命基礎。六、余今不能不調重兵於粵邊，以鎮攝之矣。」蔣並於本月預定表寫下：「確定收拾兩廣政策」。<sup>35</sup> 以上可知，蔣認為事變的釀成乃由陳濟棠一手主導，廣西只是配合的角色。蔣對兩廣的對策主要是雙管齊下：一面宣布召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討論對日政策問題，並邀請西南派代表參加；另一方面迅速調集兵力，搶占戰略要地，爭取軍事上的主動權。

6月4日，蔣與部屬會商兩廣之處置辦法後，發電指示各方將領進行軍事準備。在福建防務方面，蔣電福建綏靖主任蔣鼎文，告以「兩廣決議叛變，先出兵湘南，其對閩取守勢，我軍應即秘密布置，除派一旅鎮守福州外，其外凡可集中之中央部隊，應盡量集中，如何部署，盼詳復。」<sup>36</sup> 6月6日，蔣又電蔣鼎文，「告以兩廣反動勢或不免，恐其先襲閩西，應從速秘密戒備。」並要求其調動部隊應特別秘密，須在夜間行動，加強漳州與龍岩的防禦工事。<sup>37</sup> 其次，在貴州防務方面，蔣電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告以「兩廣決議叛變，預定刪（15）日集中柳州與永州，以待各方響應，此時貴陽應積極準備，以防其先襲擊貴陽也，一面集中兵力，先令萬甘兩師集中於貴定與黃平之間，而令郝師

<sup>34</sup>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從九一八至七七》，頁248-250。

<sup>35</sup> 《事略稿本》，1936年6月2日。

<sup>36</sup> 《事略稿本》，1936年6月4日。

<sup>37</sup> 《事略稿本》，1936年6月6日。

與裴師集中貴陽以東地區，候命出發，防守貴陽部隊，暫以九十九師任之，何時可集中完畢，即復。」<sup>38</sup>並要求「星夜用汽車輸送前進，構築堅強工事，貴陽陣地應特別注重其空軍之襲擊為要。」<sup>39</sup>從蔣屢電顧祝同指示防務的情況來看，可知蔣認為廣西軍隊極有可能入侵貴州。<sup>40</sup>不過蔣自思「對粵對桂應分別進行，對桂以柔為宜」。<sup>41</sup>但是「白崇禧校閱湘邊桂軍，而桂軍又有兩師開到郴州，且已下動員令」<sup>42</sup>，形勢十分緊張。

兩廣事變爆發後，湖南處在一個對寧對粵均舉足輕重的地位。西南發出冬、支兩電後，粵桂軍分別向湘贛兩省的邊境推進，尤以湖南的衡州（又稱衡陽）是志在必得的第一步目標。根據時任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陳誠的觀察，「其時湖南省主席何鍵與兩廣方面確實交往的很熱絡，雙方信使經常往來湘桂道上，等衡州一易手，何鍵倒向兩廣，殆已不成問題。因此衡州在兩廣事變中是禍福轉移的樞紐。衡州不保，則武漢可能不保，武漢不保，則全局震動。素日不滿中央的軍閥，仍所在多有，誰能保證他們不為這種新的形勢所動搖？再加上日人的分化作用，則又一個大混亂的局面，是很有可能出現的。」<sup>43</sup>

既然衡州為寧粵雙方兵家必爭之地，湖南省主席何鍵的態度就相當關鍵。陳誠於6月9日到了長沙，當晚便與何鍵會談。在會談中何氏認為兩廣出兵抗日，政府不應加以阻止，如果兩廣部隊通過湘境，自應准其假道。而陳誠強調中央為消滅戰禍，必先占領衡州。陳、何兩人談話極不投機，主因是桂軍代表李品仙正在長沙，而李氏對何鍵極力拉攏。之後陳誠嘗試第二次與何鍵會談，說明中央已派兩師人到了長沙，接著還有20個師將來對付這次兩廣的異動。見狀如此，何鍵轉而支持南京的作為。此時桂軍離衡州僅30里。桂方得到的情報，以為南京已派三個師到衡州，而不知是三個師長。此時桂方的先頭部隊如欲到衡州尚需三個鐘頭。本來粵桂兩軍的作戰計畫，是以粵軍集中後待桂軍占領衡州，再行進攻為原則。此次南京占了先著占領衡州，使得全盤局

<sup>38</sup> 《事略稿本》，1936年6月4日。

<sup>39</sup> 《事略稿本》，1936年6月5日。

<sup>40</sup> 《事略稿本》，1936年6月6、7日。

<sup>41</sup> 《事略稿本》，1936年6月8日。

<sup>42</sup> 《事略稿本》，1936年6月9日。

<sup>43</sup>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臺北：國史館，2005年），頁133。

勢大變。<sup>44</sup>一場箭在弦上的戰禍，終於沒有爆發，使南京得有徐圖政治解決的時間。<sup>45</sup>故於6月11日蔣電顧祝同表示「我軍確已掌握衡陽，兩廣逆謀或可制止」。<sup>46</sup>此時，蔣思考處理粵桂的先後順序，考慮「先對桂和緩如何」<sup>47</sup>，認為「定粵先於安桂」。

在取得軍事要點衡陽後，蔣的德國軍事顧問法肯豪森將軍（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陳述對兩廣問題處理意見：

一、對兩廣問題宜急求澈底解決。鑒於對外局勢，斷不容背後另有野心勢力任其久存，故宜樹立中央政府之絕對統治權。……四、目前宜求在一處迅速獲一重大軍事勝利，按全盤狀況，僅對兩廣此舉未始不可辦到。……六、目前粵桂固聯合出師，然其利害斷非一致，故主攻宜對一省，廣西有一種優點，即與他國，尤要者為與日本無大關係，但太僻遠，且交通太少，未能迅速平定，故征服廣東轉形容易迅速，速獲勝利極關重要。七、利用浙贛鐵路及沿海船舶運輸，贛境集中攻擊兵團，自極迅速，盡量集中調整師附屬新式重兵器，另一兵團，集中於長沙之南（粵漢路），另一小部集中閩南。各兵團之任務：甲、長沙兵團：支持戰之防禦，絕對固守邵陽—衡陽之線。乙、江西兵團：經贛縣—南雄之線，一般南面向廣州攻擊前進。丙、福建兵團：一般向廣州攻擊前進。貴州境內可以應用兵力直接向南寧前進。……八、宜用擴大宣傳及類似方法向兩廣人民以及中央政府勢力所及各省說明真相，尤要者為向對方軍隊，使發生影響，頗形重要。<sup>48</sup>

蔣對兩廣所作的軍事準備與政治宣傳與此意見書相距不遠。尤其此意見書明白揭示了攻粵先於定桂，蔣要解決兩廣事變，必先搞定廣東不可。

由於出師衡陽不利，兩廣當局的態度出現鬆動跡象，指派代表赴京與中

<sup>44</sup>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頁136。

<sup>45</sup> 陳誠口述，柳克述筆記，〈兩廣六一事變處理經過〉，《傳記文學》，第53卷第3期（1988年9月），頁37。

<sup>46</sup> 《事略稿本》，1936年6月11日。

<sup>47</sup> 《事略稿本》，1936年6月12日。

<sup>48</sup> 「法肯豪森顧問致劉副任意見書」（1936年6月11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8冊，「兩廣事變」，編號15，《蔣檔》，國史館藏。

央溝通會談。王子壯對西南局勢的觀察為「比來兩廣之消息又稍緩和，蓋兩廣得悉中央方面之勸告及全國輿論之責備，已通電表示撤回軍隊以待中央之命令，西南執行部及政務委員會於16日來電即表示此意，但廣西方面似仍在積極集中軍隊，單獨亦無撤兵之表示，同時東北各江積極佈置軍事，招納李濟深、翁照垣等均往廣西擔任軍政參事，良以此次首要為白崇禧，北伐時為參謀長，其人富有韜略，其進取之志亦最急，由其種種動作觀之，絕難遽爾息兵。」<sup>49</sup> 同日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自記道：「連日西南局勢依然無變化，暗中備戰甚亟。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三人今日來一電，自辯出兵純係對外，絕無絲毫其他作用，且有誣詆中央之語，竟謂中央調平漢路軍隊南下，在粵桂出兵湘省之先，顛倒至此，知其必將倒行逆施矣。」<sup>50</sup> 從以上兩份材料可看出，寧粵之間的和平談判已告破局，粵桂不願意接受南京所提的統一軍政軍令等條件，其中尤以廣西白崇禧的態度最為強硬，故寧粵均暗中進行備戰，整體局勢呈現外弛內張之狀。

和談條件未成之後，粵桂又有進一步的軍事行動，這使得西南局勢再度緊張。22日，兩廣組獨立軍事委員會，陳濟棠任委員長兼總司令，李宗仁為副手。23日，陳濟棠任抗日救國軍第一集團軍司令，李宗仁、白崇禧分別為抗日救國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和副司令。蔣中正聞訊歎曰：「兩粵終不悔禍矣乎。」<sup>51</sup> 之後幾天，兩廣的軍事動作頻頻。25日，蔣得報「陳濟棠、李宗仁等迭開軍事會議」，其電告何鍵、陳誠：「桂軍預定計劃傾巢犯湘，現益積極決不停止，除寶慶、祁陽、衡陽、湘潭、株州各地切實構築工事固防外，其他如湘鄉、寧鄉、益陽、永豐、司洪橋、衡山各要地，亦須趕速構築工事，限令半月內一體完成。」<sup>52</sup> 27日，蔣早起得報「一、粵軍六師集中贛南，陳（濟棠）、李（宗仁）等會商時局應付辦法。二、李宗仁、白崇禧在粵邕分就總副司令職。三、陳濟棠、李宗仁等集議軍事具體計畫，白崇禧赴零陵指揮前線部隊。四、粵新編第四第五兩軍成立。五、翁照垣率部由邕出發全州佈防。」蔣觀而歎

<sup>49</sup>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第3冊：民國25年），1936年6月19日記事，頁171-172。

<sup>50</sup> 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東南印務出版社承印，國史館藏），1936年6月19日記事，頁136。

<sup>51</sup> 《事略稿本》，1936年6月22日。

<sup>52</sup> 《事略稿本》，1936年6月25日。

曰：「內外憂慮日益加重且緊乎。」<sup>53</sup>

而兩廣局勢在7月初有了變化。7月2日，黃志剛等10多名飛行員及7架飛機北上經南昌投奔南京。<sup>54</sup>7月6日，駐防粵東的第一集團軍第二軍副軍長兼東區綏靖委員李漢魂出走香港，通電「封金掛印」，勸陳濟棠懸崖勒馬，批評其抗日名實不符，應及早服從中央。<sup>55</sup>而第一軍軍長余漢謀的動向更為重要，蔣於6月28日就與余氏有電文的往來，表示對余漢謀駐守贛南的防地部署有所諒解。<sup>56</sup>7月3日，蔣自記「余漢謀態度變異之研究」。<sup>57</sup>5日，蔣預定「委任余漢謀職位」，見余氏通訊代表「楊竹軒與談余漢謀來歸事」。<sup>58</sup>7日下午，蔣考慮應注意各項，「余漢謀來京，李漢魂在港，黃志剛早已到京，是廣東已無大問題，而廣西或亦可轉化就範乎。」<sup>59</sup>

余漢謀到京支持中央後，7月9日余氏電粵各將領擁護中央。<sup>60</sup>同日，蔣中正決委李宗仁、白崇禧與黃旭初以原職，而獨調陳濟棠來京，並電勸陳氏自動辭職保全公私。<sup>61</sup>10日蔣令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張定璠轉告桂方白崇禧應接受中央命令。<sup>62</sup>11日，蔣「聞陳濟棠召各軍官徹夜會議，笑曰，不義之人已見眾叛親離，其尚以有所為乎。」注意「防止粵銀運桂」。<sup>63</sup>13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通過唐紹儀等31委員的提案，宣布撤銷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並決議免去陳濟棠本兼各職，改任余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整理全省軍事，任李宗仁為廣西綏靖主任，白崇禧為副主任；組織國防會議，任命陳

<sup>53</sup> 《事略稿本》，1936年6月27日。

<sup>54</sup> 敖倫，〈我參加廣東空軍倒陳投蔣〉，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南天歲月——陳濟棠主粵時期見聞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531-532。

<sup>55</sup> 胡銘藻，〈李漢魂封金掛印與余漢謀回粵倒陳紀要〉，《南天歲月——陳濟棠主粵時期見聞實錄》，頁508。

<sup>56</sup> 《事略稿本》，1936年6月28日。

<sup>57</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3日。

<sup>58</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5日。

<sup>59</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7日。

<sup>60</sup> 「余漢謀致粵中各將領佳電」（1936年7月9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8冊，「兩廣事變」，編號29，《蔣檔》，國史館藏。

<sup>61</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9日。

<sup>62</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10日。

<sup>63</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11日。

濟棠為常務委員。蔣考慮，「對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多發勸戒電令。」<sup>64</sup> 14日，何鍵致電陳濟棠，勸其到京接受國防會議委員的任命。<sup>65</sup>

此時白崇禧也發現陳濟棠內部不穩，處境危殆，就派人向其提出了三項緊急對策：一、成立粵桂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二、將可靠部隊集中廣州周圍，採用內線作戰的方針；三、軍需及裝備全部運到西江上游，背城借一，粵桂省鈔交互使用。但陳濟棠僅接納一條：成立粵桂抗日聯軍總司令部。<sup>66</sup> 16日，陳濟棠、李宗仁宣布就任抗日救國軍第一、四集團軍聯軍總司令，副總司令。<sup>67</sup>

6月17日陳濟棠召開緊急軍事會議，當眾表示決定下野。23日，蔣得報，「余漢謀已抵廣州，粵局既定，桂亦不難定矣。」<sup>68</sup> 由此看來，兩廣事變的落幕似乎指日可待，但是事件的後續發展卻有了曲折的變化。

### 叁、對桂態度突轉嚴峻

在廣東即將收服之際，蔣中正的態度是既然廣東局勢已在掌握之中，對廣西就可暫時放鬆，不問其抗日名稱是否取消，先給予財政補助，使其配合中央決策，希望使粵桂局勢早日安定。<sup>69</sup> 故在陳濟棠下臺前後，蔣對桂系的方針初以「入粵桂軍」的處置為重點，希望桂軍早日退出粵境。<sup>70</sup> 19日電新任廣東綏靖主任余漢謀，「惟對入粵之桂軍應特別注重，彼能自動退桂更好，否則必須設法掃除以固根據為要」。<sup>71</sup> 蔣在陳濟棠下臺，廣州局勢混沌不明之時，首要工作希望余漢謀儘快帶兵進入廣州，掌握廣東局勢，以免廣州城為桂軍先占。<sup>72</sup> 至於對桂系的態度還是維持二中全会的決議，委以原來的職務。但是如

<sup>64</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13日。

<sup>65</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14日。

<sup>66</sup> 蕭自力，《陳濟棠》（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446-448。

<sup>67</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16日。

<sup>68</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23日。

<sup>69</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15日。

<sup>70</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16、18日。

<sup>71</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19日。

<sup>72</sup> 「蔣委員長致余漢謀號電」（1936年7月20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8冊，「兩廣事變」，編號45，《蔣檔》，國史館藏。

果廣西可以歸順中央，對蔣而言當然更好。故此時浙江省主席黃紹竑向蔣提出建議，「伯南離粵，此後問題全在桂省，職經迭電勸告，至今尚無回電表示，是否另有意圖，負隅頑抗，殊難逆料，惟職意不如迅速使其崩潰而易收拾，故職擬親赴港粵一行，庶可就近迅速進行。」蔣批示，「兄赴港甚贊成，請積極負責籌畫為盼。」<sup>73</sup>

就桂系而言，在陳濟棠即將垮臺之時，白崇禧立即拍電報給人在廣州的李宗仁，無論要李宗仁如何必須和陳濟棠力爭實現要給廣西的 400 萬元，至 7 月 14 日，白得到李宗仁的復電說：「陳濟棠快要走了，只能撥給廣西 200 萬元。」白拿著電報一面說：「陳濟棠不守信用」。一面又說：「總算不是頂壞，給了一半」。<sup>74</sup> 之後李宗仁回到廣西後，李、白認為態勢孤立，打算對蔣緩和。7 月 20 日，李、白分電貴州省政府主席吳忠信、張定璠、黃紹竑，表示廣西抗日主張不變，只希望在中央統籌之下，共同策畫進行。<sup>75</sup> 同日黃紹竑等三人電蔣，轉告李、白確實有意服從中央。<sup>76</sup> 7 月 22 日，蔣接到情報，「港電，傳（李）宗仁號在邕開會，各將領多主和平息爭，李、白亦不堅持，即席決電中央服從命令……桂將領致中央電即發出，並派（李）品仙飛京接洽，一說派（張）任民。」<sup>77</sup> 7 月 24 日，李、白又再電南京國民政府，謂定 8 月 1 日各就廣西省綏靖正副主任職，請中央派大員蒞邕監督。<sup>78</sup> 以上可知，廣西已經準備和中央妥協，而且蔣也收到相關電文和情報，看來兩廣事變即將告一段落。

但是蔣的對桂態度突然有了大幅度的轉變。7 月 21 日，蔣考慮「對桂決

<sup>73</sup> 「黃主席紹竑呈蔣委員長皓電」（1936 年 7 月 19 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 28 冊，「兩廣事變」，編號 43，《蔣檔》，國史館藏。

<sup>74</sup> 黃啟漢，〈回憶桂系的「六一」事變〉，頁 687。

<sup>75</sup> 程思遠，《白崇禧傳》（臺北：曉園出版社，1989 年），頁 189-190。

<sup>76</sup> 「黃紹竑呈蔣委員長號電」（1936 年 7 月 20 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 28 冊，「兩廣事變」，編號 46，《蔣檔》，國史館藏；「吳主席忠信及張委員長定璠呈蔣委員長號電」（1936 年 7 月 20 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 28 冊，「兩廣事變」，編號 47，《蔣檔》，國史館藏。

<sup>77</sup> 「蕭社長同茲呈蔣委員長養電」（1936 年 7 月 22 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 28 冊，「兩廣事變」，編號 51，《蔣檔》，國史館藏。

<sup>78</sup> 程思遠，《政海密辛》，頁 90。

撤李、白派黃主持」，<sup>79</sup> 24日，擬調黃紹竑為廣西綏靖主任。<sup>80</sup> 7月25日，蔣決定「對李宗仁、白崇禧已可撤換矣，雖帶二分危險無妨也。」下午，蔣決定發布命令如下，「（1）廣西綏靖主任李宗仁副主任白崇禧，久不到任著即免職，另候任用。（2）浙江省政府委員兼主席黃紹竑另有任用，著免本兼各職。（3）特派黃紹竑為廣西綏靖主任，李品仙為副主任。（4）特派李宗仁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5）特任白崇禧為浙江省政府委員與主任。」<sup>81</sup> 由以上任命看來，蔣似有在中央控制廣東之後，行調虎離山之計，趁機解決廣西半獨立的態勢。而王子壯的觀察為：

驟見此令似覺奇陡，實則顯示中央欲澈底解決兩廣問題也，黃原為桂系，近任中央內政部長及浙江省政府主席，欲彼回桂所以收拾其殘局，白主浙江省自無由再行割據，李任軍委會常委，只不過任中央絕無實權也，此事之發表在李、白呈報允任綏靖正副主任之後，蓋恐其就職後仍可就其現在經營之基礎而再事反抗，且外方謠傳彼將與共黨妥協以事抵抗，果爾是其計之毒辣，有將養癰貽患之一日，故出此快然一割也，微聞此計之係楊永泰之所獻，以此事發表於蔣到廬山之後。<sup>82</sup>

而根據黃紹竑的回憶也認為此調職令的發布是楊永泰的主意。<sup>83</sup>

而蔣對桂突採嚴峻的態度，其原因除了可能是楊永泰的建議外，《事略稿本》的記載透露了蔣內心世界的想法。7月23日，「午，研究粵局，測知余漢謀已有拒中央軍入粵之意，乃令陳誠赴粵與之切商方針與處置辦法。」<sup>84</sup> 8月1日，「自撰七月份反省錄如左，……三、粵陳雖去而李、白猶思負隅，故對桂處置必須審慎運用，以求正當，萬不可以輕忽出之。四、對桂調李、白之新命，決然頒下雖冒幾分危險，但此令不下，則李、白陽示和平之際，中央軍

<sup>79</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21日。

<sup>80</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24日。

<sup>81</sup> 「蔣委員長致魏文官長懷翁秘書長文瀨有電」（1936年7月25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8冊，「兩廣事變」，編號52，《蔣檔》，國史館藏。

<sup>82</sup>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第三冊：民國25年），1936年7月26日記事，頁208。

<sup>83</sup> 黃紹竑，〈我與蔣介石和桂系的關係〉，《廣州文史資料》，第7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62年），頁90。楊永泰時任湖北省主席。

<sup>84</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23日。

無機入粵，是不僅桂方不平，而粵事亦不能了，此著之妙用，世人不知其所以然，亦莫怪也。五、自思對於兩廣處置之方針與政治運用之步驟，幸無失真。」<sup>85</sup> 原來新任廣東綏靖主任余漢謀非蔣嫡系將領，余漢謀初入廣東即有拒中央軍入粵之意，蔣恐余漢謀掌握廣東後成為陳濟棠第二，重現地方割據，因此以對付廣西為藉口，派兵進入廣東，以圖進一步控制廣東政局。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原來就惴惴不安，料想蔣會採取強硬手段。這時看到蔣要把他們調離廣西，更加肯定蔣要澈底消滅桂系。於是李、白更堅定了抗日反蔣的決心。而李宗仁對蔣中正的調職令，情緒最為激動。他說：「寧和蔣拼到底，也不任他擺弄。」李、白決定先對蔣敷衍，爭取時間，總的策略是在政治上採取攻勢，軍事上採取守勢。政治上繼續高舉抗日救國的旗幟，廣泛拉攏各民主黨派，以壯聲勢。這時除李濟深和蔡廷鍇已在南寧外，反蔣的各黨派團體也都派代表到了南寧。而蔡廷鍇在南寧號召十九路軍官兵來廣西報到，首先成立了一個師，由翁照垣任師長。軍事上不主動出擊，如果蔣的軍隊入境，就狠狠給以打擊，估計動員全省軍民苦戰三五個月是不成問題。廣西的民團、學生，大多數已動員入伍，抗日救國熱潮，一時洶湧澎湃。除救國會堅持擁護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外，各黨派多主張立即成立抗日政府，堅決和蔣中正形成勢不兩立的局面。李、白打的算盤是：只要政治上搞得好，軍事上能維持三五個月，全國局面就會有變化。<sup>86</sup> 而這點蔣也有所預料，7月31日，蔣自思「研究李宗仁、白崇禧之所欲期待者有二，甲、粵軍內訌。乙、倭寇亂華。」<sup>87</sup>

蔣在李、白調職令發布之後，為了防範廣西異動，開始進行一連串的軍事部署。7月23日，蔣考慮「應令韶關設軍委會委員長行營」。<sup>88</sup> 26日，蔣電顧祝同，告以「刻令調黃紹竑為桂綏靖主任，李品仙為副，李宗仁為軍委會常委，白崇禧為浙江主席，想李、白仍有反動，應特別嚴防其由桂經黔竄也。」<sup>89</sup>

<sup>85</sup> 《事略稿本》，1936年8月1日。

<sup>86</sup> 黃啟漢，〈回憶桂系的「六一」事變〉，頁688；劉斐，〈兩廣六一事變〉，第3輯，頁19-20。

<sup>87</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31日。

<sup>88</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23日。

<sup>89</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26日。

28日，蔣電長沙行轅陳誠、駐郴州軍長萬耀煌，告以「第十三、第九十三、第九十八各師應即準備用鐵路向南輸送，其已向小北江前進之各部隊應即令其向就近鐵路車站移用候車，並將第十三師在郴部隊先行運輸，指揮系統可就近問廣州陳參謀長辭修，入粵後當歸余總司令之指揮可也。」<sup>90</sup>同日再電余漢謀，告以「肇慶應即先派就近得力部隊前往防守，遲恐被桂軍所佔，第十三師尚在郴州沿鐵路附近，可以先行運輸加入西江，其餘第九十三與第九十八各師可繼第十三師後輸送，中意以後駐防西江部隊派第二軍之一部，而第二軍全部暫時集結於廣韶與廣九兩路及省城附近較妥。」<sup>91</sup>29日，蔣電陳誠，「頃接滬電，李、白致張伯璇、陳劭先感電稱，此間同人意志甚堅決，萬望約沈鈞儒、章乃器來桂一行等語，可知其負隅之決心，此時應對西江須特別注意，恐其出我不意襲我之虛也。」<sup>92</sup>同日再電陳誠告以「肇慶飛機場面積幾何，現在可用否，請查復。又西江應預備布設水雷，有材料否。」又電南京航空委員會周主任至柔，要求廣州肇慶機場與油彈應積極準備，<sup>93</sup>主張對付廣西應以空軍轟炸其機場，消滅其空軍以制敵機先，使領空權全操於我方。<sup>94</sup>以上可見蔣的軍事準備除了派軍隊包圍廣西之外，空軍的轟炸預備也是重點，當然最重要的是儘速派兵進入廣東。而陳布雷的觀察是「知桂省備戰益急，恐無和平解決之希望」。<sup>95</sup>

另一方面，北方實力派與桂系隱然有串連發動之態勢。8月2日，蔣考慮應注意各項，「桂方與冀魯更相應乎。……如冀魯叛變，仍應先專力解決廣西。」<sup>96</sup>而日本扶持的偽蒙軍也蠢蠢欲動。8月3日，蔣電陳誠：

豔（29）日天津會議結果決于八月八日南北兩方同時動員，以察北偽軍進攻綏遠，桂軍進取廣州，一俟桂軍佔領廣州，冀察即正式宣

<sup>90</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28日。

<sup>91</sup> 「蔣委員長致余漢謀儉電」（1936年7月28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8冊，「兩廣事變」，編號56，《蔣檔》，國史館藏。

<sup>92</sup> 「蔣委員長致陳誠艷電」（1936年7月29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8冊，「兩廣事變」，編號57，《蔣檔》，國史館藏。

<sup>93</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29日。

<sup>94</sup> 「蔣委員長致周主任致柔卅電」（1936年7月30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8冊，「兩廣事變」，編號59，《蔣檔》，國史館藏。

<sup>95</sup> 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1936年7月29日記事，頁145。

<sup>96</sup> 《事略稿本》，1936年8月2日。

布自治，據當時參加其密約之桂代表王乃昌、黃建平宣稱，桂軍可於動員十日後佔廣州，且聲言粵軍內部屆時除第一軍外，其餘大部皆可響應，尤以第三軍為最有把握等語。惟此為卅日以前之事，而世（31）日李、白忽復中之儉（28日）電，未知其內容究有變更否？總之，無論其事實如何，我軍應積極設防，務於此五日內為戰略之展開完畢，中意第十八軍兩師先調至英德、清遠為預備隊，以便隨時增加，而將連縣之夏師主力移駐陽山，另調能守之部隊約一師進駐廣寧，則布置較穩矣，又陽山直達懷集與清遠，不經四會而直達廣寧之里程及地形，以及廣寧、懷集、賀縣、開建、陽山、信都、蒼梧間一帶地區之道路里程地形，務詳密查記，以備應用，并以此意轉告幄奇（余漢謀）兄。<sup>97</sup>

蔣提防桂軍進攻廣東得逞，電陳誠協同余漢謀進行軍事部署，加強粵省邊境防務。

為了和南京中央抗衡，桂系同時也在積極進行軍事準備。7月29日，《益世報》報導：「桂省長官眷屬27日又一批由梧乘輪抵港，聞全桂形勢緊張，民團潰散甚多，港梧間商務又中斷。」「連日桂軍無異動，第一道防線駐有重兵固守，現李、白又劃興安、桂林、陽朔、昭平為第二道防線，容縣、馬平、武宜、桂平為第三道防線，刻正築防禦工事中。」7月30日，「李宗仁、白崇禧積極調兵備戰，時局復趨緊張，中央雖力求和平，但如圖謀不軌，勢不能不設法加以制止，余漢謀已迭電廬山請示，陳誠、錢大鈞仍留粵。」「廣西局面益形嚴重。一、全省軍隊悉數調往湘桂邊境，後方概由民團負責防守，白崇禧28日晨親赴全州防地視察，指揮所部佈置防禦工事，並召集前線各線各長官訓話。」「桂對湘黔兩方面完成堅固防禦工事，取守勢，調重兵集梧，圖以全力侵粵。」7月31日，「桂省情勢益趨惡化，粵在京某委員談，李、白軍事策略側重攻粵，謀取得海口，獲軍火接濟及軍餉補充，其陳兵湘黔邊，殆為聲東擊西之陰謀，余漢謀對桂已嚴密防範，如果越境圖謀不軌，自必予以遏止。」<sup>98</sup> 李、白制定對中央之作戰策劃：

<sup>97</sup> 「蔣委員長致陳誠江電」（1936年8月3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8冊，「兩廣事變」，編號61，《蔣檔》，國史館藏。

<sup>98</sup>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45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67、69-71。

(一)採內線作戰。(二)極力設法避免對方偵悉其主力及基幹部隊之所在地。(三)運用疑兵，如戰鬥力強之部隊則改民團旗幟，戰鬥力弱之民團則用正式部隊旗幟，並組便衣隊游動襲擊。(四)選擇最精銳之部隊與中央軍作戰。(五)徵集全省汽車為軍隊運輸。(六)實行堅壁清野。(七)應固守之城市嚴禁市民遷移。(八)積極整理及監視軍隊內部。(九)如不能支持時，決定西竄與朱(德)、毛(澤東)合作，如中央運用外交由安南封鎖時，則集全力衝入安南，使中央難于處置。<sup>99</sup>

在軍事準備之外，李、白決定在政治上發動攻勢，故發電南京中央，質問貿然調職的合理性。7月27日，李、白電南京云：

仁等服從二中全會決議，故於漾(23)日呈請中央派員監誓就職，乃宥(26)日即得京中新聞社消息，有國府下令更調仁等職務之訊。如果所傳非虛，則仁等服務黨國何事不可，所深惜者黨國最高權力二中全會之決議案，且為國府接受而經見諸明令矣，乃不及旬日又被推翻，意者此中必有重大原因所在，仁等莫解真相，乞明教。

蔣請軍政部長何應欽答覆稱：

中央以發表兄等綏靖職務以後，為時旬日未得兄等正式就職表示，故為使兄等益展長才並兼顧國家與地方此時之需要，對於時地人事務使益得其宜，乃請兄等出任新職，全出於借重兄等之誠意，亦屬公私兼顧之苦心，且以季寬(黃紹竑)、鶴齡(李品仙)繼兄等主持綏靖，尤為愛護桂省，使各能相安，兄等事業得以繼續勿替，至任命地方官吏，原屬政府之職權，且全會決議亦無時間上不可變更之限制，以某所知，此舉實毫無他意，兄等對黨部與政府權責必所深知，一經說明當不致於誤會，現在中央及浙省均盼二兄早日履新，務請接受新命，以慰公私之盼望。<sup>100</sup>

這兩封電文爭論的重點在於李、白認為二中全會的決議不應隨意變更，如變更應有重大原因；而蔣的態度認為調職是為了讓李、白「更展長才」。8月1

<sup>99</sup> 《事略稿本》，1936年8月13日。

<sup>100</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31日。

日，蔣又發東電進一步說明中央的決策，政府改調二人職務的用意是「為了保全其在廣西的令名，留桂省民眾對兄等之好感」，如此說詞相信很難讓李、白二人心服口服。不過蔣點出了關鍵提醒李、白：廣西財政狀況不佳，桂系還有多少籌碼能跟中央相抗衡，不如早日和南京合作。<sup>101</sup>

而李、白 7 月 31 日發世電稱，「更調新職，中央苦心措置，職等無不盡諒，唯關於抗戰救亡大計仍懇為更明確具體之指示，俾使遵循此間善後事宜，俟與季寬兄面商決。」<sup>102</sup> 李、白此電，蔣的解讀是，「似李、白已不能堅持也」。<sup>103</sup> 蔣以冬（2 日）回稱地方軍人應遵中央號令，接受中央所畀予之一切任務，放棄割據以完成國家統一。<sup>104</sup> 看蔣的回電內容相信很難打動李、白的心，要其放棄廣西轉而效命中央。故蔣的回電目的主要是站穩中央的立場，呼籲團結，並爭取輿論的支持。

輿論對李、白抗命中央的行動也不表贊同，其立論以全國統一團結為基調。7 月 31 日，《大公報》社評：

吾人現願警告李、白，速悟數點：（一）苟李、白接受新命，社會對之，仍有同情，中國事業，大矣多矣，何必非把持廣西不可。（二）如必反對政府之任命以為不堪接受，則只有自己潔身以退，不應使廣西軍民，為個人業已失敗的政治企圖而殉。（三）國家大勢，必需要軍政軍令之統一，陳濟棠崩潰以後，李、白固當分負咎責，不應執迷不悟，必應反省，自 6 月 2 日李、白與陳濟棠共同發動之一套的言論行動，早已實際上失其號召能力，今仍強為之，除使桂民苦痛之外，更毫無意義矣。……同時則願進言於政府當局曰：處理桂局，應儘量以下列兩點為原則。其一：上月 27 日蔣委員長發表四項聲明之旨趣，其二：二中全会決議案之精神。就前者言，蔣委員長所稱「中央必本對內和平統一之政策貫徹到底」，在今日粵局已定，李、白行動不能阻礙大勢之時，此項旨趣，應更易

<sup>101</sup> 《事略稿本》，1936 年 8 月 1 日。

<sup>102</sup>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 45 冊，頁 90。

<sup>103</sup> 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1936 年 8 月 2 日記事，頁 147。

<sup>104</sup> 《事略稿本》，1936 年 8 月 2 日。

於貫徹。就後者言，陳、李、白共同異動，而二中全會免陳而留李、白，是於李、白，有特予保全不究既往之意。<sup>105</sup>

《國聞週報》：「照目前形勢，廣西問題，利在速了，然前途激折，恐仍難免，吾人為國家著想，實萬分企盼李、白之能應命北上，白之主浙，尤為眾望所歸。」<sup>106</sup>「廣西問題之波折，近益趨擴大，西江方面，已發生小接觸，外電且傳將成立組織之說。然就大勢判斷，廣東既已上軌道，廣西在環境上，均無向外發展之可能。李、白之抗未就命，殆僅為爭一時之意氣。」<sup>107</sup>輿論認為李、白以「抗日」為號召，已失去其正當性，應服從中央號令，而南京應以和平統一的方式解決廣西問題。

## 肆、和與戰之間的考量

在和戰未定之際，陳誠的觀察是「粵軍整編大體已就緒，對桂部署亦有基礎，惟極望能和平解決也。然以中央此次之命、雖以善意解釋，終不免令人難堪。再以李、白之個性、意氣，恐有孤注一拼之可能。」<sup>108</sup>而對桂究竟是和抑戰，蔣中正有他的考量。蔣以包圍桂系為名派兵入粵達成初步控制後，對廣西的態度有放鬆的跡象。雖然對蔣而言最好的結果是迫使李、白離桂，澈底控制廣西，但是桂系的態度相當頑強，不輕易向中央屈服。因此蔣如要貫徹意志，恐不免與桂系一戰，如此雖可達成目標，南京也會付出沈重的代價，況且國內外局勢是否允許蔣如此做也有相當大的疑問。因此蔣必須思考是否有其他解決桂局的方法。8月3日，蔣召開會議討論對桂方針，決定派員赴桂勸

<sup>105</sup> 〈廣西善後之波折〉，《國聞週報》，第13卷第31期（民國25年7月29日至8月4日），〈論評選輯〉，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總頁2362。

<sup>106</sup> 〈桂局善後尚待努力〉，《國聞週報》，第13卷第30期（民國25年7月22日至7月28日），〈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7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總頁6167。

<sup>107</sup> 〈桂局尚有和緩可能〉，《國聞週報》，第13卷第31期（民國25年7月29日至8月4日），〈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7輯，總頁6175。

<sup>108</sup> 陳誠著，何智霖、高明芳、周美華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臺北：國史館，2006年），頁399。

解。<sup>109</sup> 陳誠電蔣主張對桂應採政治解決方式。蔣回電道：

對桂謀政治之解決本為原定之方針，一遇機緣即當進行，但未知此議起自桂方抑由弟等自動提議，若桂方果有此意，自可與之討論，否則不必由我急提，此時應先求部署完妥穩固為要，至於德鄰（李宗仁）之名義，不如以行營主任名義為妥，或以行營名義指揮湘桂兩省，但粵不能加入在內，必須待健生（白崇禧）來浙或離桂方能發表，請與惲奇（余漢謀）、慕尹（錢大鈞）慎重切商之。<sup>110</sup>

以上可見蔣決定稍退一步，同意李宗仁繼續主桂，而白崇禧離開廣西，如此一來可讓寧桂雙方都有臺階可下。

此時仍有其他人士入桂，試圖調和寧桂雙方劍拔弩張之情勢。如章士釗曾以私人資格兩度赴桂，勸阻軍事行動。<sup>111</sup> 章的看法是「桂方態度極堅持，唯如中央取消後命，則決可服從。」<sup>112</sup> 何應欽與章士釗談話後，電蔣報告桂方態度：「李、白似決無就新職，其結論：一、桂方將領表示中央果信任李、白為真正抗日者，應使繼續完成其工作，李、白自當在中央指導下繼續努力。二、季寬（黃紹竑）決不能回桂，因二層幹部反對甚力。三、桂軍民之組織，確可為抗日之用，中央對桂若用武力，桂不外取：1. 傾巢向一點突擊；2. 固守死力抵抗。」何應欽建議「宜取政治解決，其法：（一）令李到京任軍會常委；白任桂綏靖主任。（二）以李任軍會常委，以季寬任桂綏靖，白副之。」蔣回電道：「切不可有此主張，且千萬勿與他人作此語氣。」<sup>113</sup> 當時身在南京的何應欽之建議其實與蔣的盤算相當接近，但蔣要求何勿聲張，或許是不想讓桂系太早得知的南京談判籌碼，且蔣希望主導和平談判的進行。

<sup>109</sup> 《事略稿本》，1936年8月3日。

<sup>110</sup> 「蔣委員長致陳誠江電」（1936年8月3日），〈革命文獻——統一時期〉，第28冊，「兩廣事變」，編號62，《蔣檔》，國史館藏。

<sup>111</sup>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45冊，頁93。

<sup>112</sup> 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1936年8月6日記事，頁148。

<sup>113</sup> 「何應欽電蔣中正歌電」（1936年8月5日），〈特交文卷〉，「親批文件——民國二十五年一月至民國二十五年九月」，《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70100-00043-049。

從李、白的角度來思考，其立場當然是拒絕南京所下的調職令，力圖繼續留在廣西掌權。但是李、白的處境實在困難，面臨著內憂外患的挑戰。外有南京的軍隊包圍，內部經濟財政不斷惡化。甚者為了擴充軍隊大行徵兵，使原來經濟狀況更是雪上加霜。雲南省主席龍雲的觀察為：「桂內部經濟金融極恐慌，且屢以徵兵激起民變，亦甚不安也。」<sup>114</sup>《華北日報》7月11日報導：「桂實行強迫徵兵，騷擾人民，旅桂粵商紛紛離境東下，邕垣市況蕭條，桂鈔狂跌，米價飛漲，每担達二十三元，美孚等火油公司須港紙交易，拒用桂鈔。桂因糧食恐慌，由省府勒令各縣，督率各鄉鎮村長，借用民地辦理公耕，各村長至少須耕田四十畝。」7月18日，「桂米價奇漲，每元僅可購三斤，梧商會請取銷攜外幣出境條例。」<sup>115</sup>

蔣對廣西的經濟情況也有所掌握。其認為李、白7月31日的世電透露出「已不能堅持也」，<sup>116</sup>主因是廣西的財政面臨困境。蔣早在7月16日就已觀看「對於兩廣財政問題」報告，了解「廣西軍費支出之膨脹造成財政上之不安與廣東無異，而因廣西是比較窮困的省份，軍事工業的發展與軍費支出的膨脹，除了直接轉嫁於人民的負擔上，或在財政歲入謀畸形的收入之外，別的則無方法可想，因此廣西省財政上的危機較之廣東省嚴重十倍。」<sup>117</sup>而報告書中所記廣西省歲入如下：

<sup>114</sup> 「龍雲轉告粵桂不聽調停陳將下野桂系亦甚不安電」，1936年7月18日，收入雲南省檔案館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雲南部份）》（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年），頁611。

<sup>115</sup>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45冊，頁4、35。

<sup>116</sup> 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1936年8月2日記事，頁147。

<sup>117</sup> 《事略稿本》，1936年7月16日。

表 1、廣西省財政歲入一覽表（1932 至 1934 年）

單位：元

項目	民國 21 年	民國 22 年	民國 23 年
田賦	2,924,507	2,219,072	2,111,324
契稅	172,000	165,719	201,737
營業稅	614,457	504,176	2,134,200
房捐	56,352	47,081	47,200
船捐	45,000	54,000	74,700
地方財產收入	17,852	19,293	175,898
地方事業收入	363,185	274,776	274,781
地方行政收入	3,139,144	6,170,056	12,806,712
補助款收入	810,908	0	57,700
債款收入	1,505,862	2,000,000	1,520,000
其他收入	3,594,028	4,601,723	784,180
地方營業純益	0	372,384	462,746
司法收入	0	0	88,158
雜稅捐收入	0	0	6,268,791
雜捐收入	0	0	302,854
補收臨時收入	0	0	360,000
合計（普通歲入）	13,243,295	16,428,280	27,670,981
地方行政收入占普通歲入比例	23.70%	37.56%	46.28%
債款收入占普通歲入比例	11.37%	12.17%	5.49%
田賦占普通歲入比例	22.08%	13.51%	7.63%

資料來源：整理自《事略稿本》7月16日「對於兩廣財政問題」的報告。

報告書提到所謂「地方行政收入」，大部分就是禁煙罰金，是鴉片過境稅的收入，1932 年占歲入比例為 23.7%，至 1934 年竟占了 46.28%，幾近五成的比例。債款收入也表明廣西財政之不敷，必須每年借債。由上可知廣西財政依賴鴉片稅收之程度，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且必須每年借款以填補財政之缺口。另外根據黃紹竑的回憶指出，廣西是雲、貴兩省運銷廣東及香港、澳門、廣州灣必經的道路，禁煙罰金收入幾占地方收入半數以上，而事變後蔣在雲南、貴

州加以封鎖，此舉對桂系實構成沈重的打擊。<sup>118</sup> 尤其兩廣事變後廣西的財政開支大增，每個月的軍費超過 700 萬元，但每個月的財政收入不到 200 萬，即使發行 2,000 萬元省金庫券也無濟於事。<sup>119</sup> 龍雲更認為「李、白處此全省金融敗壞，民心不安之時，無論戰守，均必陷於絕境也。」<sup>120</sup> 「中樞對桂，亦頗欲以政治手腕解決。桂甚倔強，未肯甘心，唯其經濟甚感困難，民怨沸騰，結果恐未必佳之耳。」<sup>121</sup> 因此，當南京有意展開和平談判時，廣西在內外壓力下不得不和中央談判，於是寧桂雙方展開和平談判的嚐試。

8 月 7 日，蔣得陳誠、余漢謀報告謂：「李、白已派其總部高級參謀劉為章（斐）隨同香翰屏、鄧世增來粵商談和平」。<sup>122</sup> 8 月 11 日，蔣乘飛機離牯嶺赴粵，「當晚與陳誠、錢大鈞、余漢謀、黃慕松等商談解決桂局問題，（一）政治解決。（二）軍事解決惟萬不得已採用之，但為防範起見，不得不充實監視力量云。」<sup>123</sup> 廣西談判代表劉斐 11 日到達廣州，12 日與蔣會面。劉斐會面前判斷蔣對廣西問題有和的可能，因為其大部兵力如果被廣西拖住，曠日持久不決，其他的問題就會更多。<sup>124</sup> 從陳誠的記載可看出會談的具體內容：

桂省刻正積極進行政治解決。今日我預定三案，與桂方代表及朱主任（培德）、居院長（正）、程總長（潛）、余漢謀等研究。結果採取第二案，此案委座亦極贊同。即健生兄（白崇禧）出洋，在出洋期內，浙省主席職務由李寬（黃紹竑）暫代；而李寬之桂綏靖主任，由德鄰（李宗仁）兼代；省府照舊由黃旭初負責。大體如此。此後祇看德鄰、健生情形如何耳。<sup>125</sup>

<sup>118</sup> 黃紹竑，〈新桂系與鴉片烟〉，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34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 年），頁 191。

<sup>119</sup> 黃啟漢，〈回憶桂系的「六一」事變〉，頁 688。

<sup>120</sup> 「龍雲轉告李、白對任命進退維谷電」，1936 年 8 月 5 日，收入《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雲南部份）》，頁 613。

<sup>121</sup> 「龍雲粵事可望政治解決電」，1936 年 8 月 5 日，收入《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雲南部份）》，頁 614。

<sup>122</sup> 《事略稿本》，1936 年 8 月 7 日。

<sup>123</sup> 《事略稿本》，1936 年 8 月 11 日。

<sup>124</sup> 劉斐，〈兩廣六一事變〉，頁 23。

<sup>125</sup> 陳誠著，何智霖、高明芳、周美華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頁 401。

蔣 8 月 12 日接見劉斐「剴切示以中央對處置桂局之苦心，并愛護李、白兩同志」，劉斐謂「今已得李、白電委為全權代表，遂代李、白陳述和平辦法」。兩人會談後，蔣修改和平辦法如下：

（一）桂省有相當自治權，中央軍可不入駐桂省。（二）李宗仁仍任南寧綏靖主任，李品仙副之，白崇禧下野，李濟深離桂，黃旭初任桂府主席。（三）桂軍改編更易軍號及番號，軍政軍令悉統一於中央，然仍由李宗仁主持之。（四）黨政財加以整理，由中央按月撥款助桂建設。（五）桂省新任黨政軍人員聯電明確表示擁護中央完成統一。

劉回答將回桂覆命。<sup>126</sup> 劉斐返桂後，李、白 14 日在南寧開黨政軍最高幹部聯席會議，意見分歧，無結果。15 日繼開，作最後決定。<sup>127</sup> 此時輿論對和談結果也極為關心。《大公報》稱：「望李、白確切反省，而政府儘量涵容也。……望桂局早安，以便中央得專心肩負內政外交上之重大責任也。」<sup>128</sup> 不過 14 日劉斐初步的回電，陳布雷言「措詞極空洞，知桂事解決不易矣。」<sup>129</sup> 8 月 17 日，蔣召朱培德、陳誠商對桂問題：「（甲）人選；（乙）戰略以先使其分為原則。」<sup>130</sup> 這應該是指蔣認為應讓白崇禧離開廣西，以析分桂系的力量。8 月 18 日，蔣在廣州早起，「思對桂事本寬大，精神苦心容忍，惟期得和平解決，日來與李宗仁、白崇禧之代表劉為章數度磋商，今劉已還桂，不知李、白究如何思之，不勝憂悶。」當天晚上，蔣接獲劉斐的回電，「李宗仁、白崇禧覆電要求非撤兵不能再談，并據密報廣西進行組織獨立政府云。公歎曰，和平竟已絕望矣乎，倭寇正企圖利用此機會來犯，而閩錫山又無決心勇氣，中國豈真已危乎，憂鬱之極，夜不能寐。」<sup>131</sup> 外有日本的侵略，內有桂系的進逼，蔣在憂慮

<sup>126</sup> 《事略稿本》，1936 年 8 月 12 日。

<sup>127</sup>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 45 冊，頁 113。

<sup>128</sup> 〈解決桂局之呼籲〉，《國聞週報》，第 13 卷第 33 期（民國 25 年 8 月 11 日至 8 月 17 日），〈論評選輯〉，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5 輯，總頁 2369-2370。

<sup>129</sup> 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1936 年 8 月 14 日記事，頁 150。

<sup>130</sup> 《事略稿本》，1936 年 8 月 17 日。

<sup>131</sup> 《事略稿本》，1936 年 8 月 18 日。

之餘，對桂策略必須重新再思考。

此時粵系軍官鄧世增 8 月 20 日飛邕，試圖再作和平談判的努力。鄧氏帶著蔣的五項條件：「一、南京任命之黃紹竑仍任廣西綏靖主任。二、白崇禧必須出洋，其浙江主席之名義可以保留。三、黃旭初仍任廣西主席。三、桂軍仍為第四路軍。五、中央軍不集中廣西，但黨務則由中央派人整頓。」<sup>132</sup> 到廣西與李、白會面。經會談後李、白的回應是「一、維持二中全會任命李、白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二、桂省軍隊非對外不能移動。三、恢復李濟深、陳銘樞自由，取消通緝令。四、迅速對日本作戰。五、恢復十九路軍。」故蔣在聽完鄧世增的報告後，歎曰「和平豈真絕望乎。」<sup>133</sup>

陳誠當時對桂方態度也有所觀察，其心得為：

桂事屢經交涉，結果可謂凶多吉少。蓋此間愈和平，而彼等愈強硬；此間愈講理，而彼輩愈野蠻。且最近有「要求中央決定抗日日期，及先撤北上以示信」之電。而蔡賢初（廷錯）等均已赴桂，並有組府之議，最後只有訴之於軍事耳。此次中央所下新令，固有令其難堪者，但最近之種種委曲，彼輩應當以國家民族為重，不應專爭意氣。而我對於李、白，私情公義，亦祇能至此。彼輩尚不能覺悟，實愛莫能助也。如戰事開始，恐須兩月方能了結。事既至此，則一切顧慮，如綏遠之李守信及西北之赤匪，只有聽之。縱任何犧牲，亦在所不惜。因兩廣之事無辦法，無論對外及剿匪均無辦法。<sup>134</sup>

陳布雷自記：「五時到退思園訪辭修（陳誠），知劉為章有電覆程頌雲（潛），有請中央撤回南下軍隊之語。白電程大意相同，知桂局和平絕望矣。」<sup>135</sup> 「鄧世增等去桂後李、白態度仍極堅執，提出要求四項，多屬節外生枝者。」<sup>136</sup> 可

<sup>132</sup>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45冊，頁130。

<sup>133</sup> 《事略稿本》，1936年8月22日。

<sup>134</sup> 陳誠著，何智霖、高明芳、周美華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頁404。

<sup>135</sup> 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1936年8月18日記事，頁151。

<sup>136</sup> 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1936年8月

知蔣方將領幕僚對廣西前途均不表樂觀，認為戰爭恐怕是無可避免。

那為何桂系在連日召開會議後，最終決定拒絕和談條件並堅持和南京對抗呢？這可分為幾個方面來探討。首先是白崇禧個人因素。在和談條件中南京願意讓李宗仁繼續主政廣西，但要求白崇禧必須下野。《大公報》報導：「蔣氏接受桂方要求，但蔣所堅持者為白崇禧必須出洋，此或為桂方不能接受之癥結。」《益世報》：「桂事現集中白崇禧下野問題，如白能去，桂事複雜性必減少。」<sup>137</sup> 王子壯對此的觀察為「廣西問題經多時間之折衝，目前似集中白崇禧一人，以中央方面可容李宗仁留桂，而必不能容白崇禧，而白則堅欲留於廣西不肯少事讓步，白如在桂則其隨時起而擾亂西南意中事也，蔣先生親至廣東，屢加研求，故於此點認為無可挽留，白既如此崛強，此問題殆將出於一戰乎。」<sup>138</sup> 可見白崇禧本人在廣西會議後決定拒絕下野，堅與中央相抗。對於白崇禧的個性，陳誠有以下的見解：

惟健生性質，不能動之以情，喻之以理，脅之以威，感之以德，實不易應付。現只有造成一種局勢，即軍事方面有妥善之部署，同時在輿論方面使其無立場，再以情、理、威、德同時行之，或可就範也。他並對人表示，現中央能作他對手打的只有我；能負和平之責者，亦只有我；將來站在一條戰線上抗日，更只有我。其目中無人，亦可知矣。<sup>139</sup>

由此可知白崇禧為人自視頗高，要制服他並不容易，必須恩威並用，多管齊下才行。第二個因素是粵系反蔣人士此時紛紛入桂，加強李、白反蔣的決心。香港消息：「李、白自李濟深及閩變主角陳銘樞等來邕後，並促李、白從速組設軍政府，謀統一指揮各部，李、白態度益趨強硬，對中央所提示之四項條件拒接受。」《大公報》報導，「蔡廷鍇到南寧、李、白反抗決心益顯著，李、白撥

---

23 日記事，頁 152。

<sup>137</sup>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 45 冊，頁 130、132。

<sup>138</sup>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第 3 冊：民國 25 年），1936 年 8 月 16-17 日記事，頁 229-230。

<sup>139</sup> 陳誠著，何智霖、高明芳、周美華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頁 401-402。

二萬人予蔡，組十九路軍。」<sup>140</sup> 第三個因素是正當李、白考慮蔣所提出的四個條件時，8月14日竟有廣西飛機叛逃至南京。《大公報》報導，「桂三機14日由桂飛粵投效，至三水遇大風，二機油罄失蹤，祇一機抵省，鄧梓湘等15日發通電，述此次離桂投效中央經過。」<sup>141</sup> 號稱團結的桂軍竟有人投向中央的懷抱，這使得李、白處境相當難堪，進而懷疑蔣派人收買己方軍隊。寧桂雙方原本互信基礎就相當的薄弱，此一事件相信會讓桂系對蔣的和談誠意產生許多質疑。馮玉祥自記道：「李、白來電言，恐介石不信實，我復以信實不信實在我，只許他人不信，不可我自己不信也。」<sup>142</sup> 馮玉祥的立場是主張雙方談和，反對內戰。但從他的記載中可發現李、白對蔣抱持不相信的態度。而李、白的戒心恐怕是雙方談判中最大的障礙。

和談破裂後，桂系的軍事行動更加頻繁。8月19日，蔣接獲軍事報告：

最近調動：第十五軍夏威部原駐桂林全州一帶，最近全部調赴大河方面分駐於博白陸川，與邊接近者蘇祖馨、王贊斌兩師，其黃鎮國之部仍駐百色一帶，以待第八軍李品仙部接防，第七軍廖磊部原駐柳州及柳城、黔邊一帶，近則調赴梧州，戎墟有周祖晃之第十九師，覃連芳之第十八師，而楊俊昌師仍守柳州，獨一師翁照垣原駐林，近已調大河岑溪一帶迫近粵之鬱南，所有百色龍州兩方則由民團改編之部駐守。圖犯粵邊：鬱林五屬之陸川博白蒼梧屬之岑溪，為粵桂邊接壤之地，又為軍事所必爭者，現夏威部擔任博白陸川之線，圖窺粵之合浦信宜，廖磊部及翁照垣部擔任岑溪戎墟火山之線，圖窺粵之鬱南、羅定，桂軍對各該線之兵力連日有增加云。重組十九路軍：自蔡廷鍇入桂恢復十九路軍，經在梧州設立辦事處，由區壽年主持，連日舊十九路軍下級幹部入桂者已達五百餘人，在港設有十九路軍官兵收容所，由沈某主持不足之數，李、白允以各屬民團補充，大縣八日，小縣五百，惟尚不及一萬人，且槍械極感缺乏云。

<sup>140</sup>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45冊，頁121、130。

<sup>141</sup>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45冊，頁113。

<sup>142</sup>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第4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頁781。

蔣看完報告的感想是「德鄰、健生一面派人講和，一面積極備戰，在彼以為聰明，惜乎，其只知對內而為反抗中央也。」<sup>143</sup> 8月22日，蔣再接報告，「桂軍事行動積極，李、白表示寧為流寇，不降中央，與蔡廷鍇輩商定敗則挾其部眾循朱毛徐共匪舊道擇山深林密之地繞道北進，白連日在飛機上辦事晨起駕機飛各要地指授戰略，晚始飛返邕，近更決定從新編配軍事部署人員，並定急攻欽廉戰略，暫分兩路，以白崇禧任第一路總指揮轄下三縱隊，第一縱隊司令廖磊，副司令楊震于，第二縱隊司令李品仙，副司令劉士毅，第三縱隊司令夏威，副司令王贊斌擔任桂北桂東作戰，以蔡廷鍇為第二路軍總指揮，轄下三縱隊，第一縱隊司令翁照垣，第二縱隊司令區壽年，第三縱隊司令沈光漢，擔任桂南桂東作戰云。」蔣觀畢歎曰：「李、白豈竟不惜犧牲黨國及其個人之歷史乎。」<sup>144</sup> 27日《大公報》報導，「桂軍24日分兩路侵粵，一路攻高州信宜，前鋒抵東鎮，一路攻靈山欽縣，前鋒抵北海，共約萬人，欲奪出海道。」29日報導，「桂軍一部已入北海，又桂軍周祖晃、翁照恒一部約七千人，確於25日陷廉江，27日進抵遂溪、麻章，欲打通出海路，向廣州灣購糧械。」<sup>145</sup>

就在桂軍節節進逼之時，蔣重新思考對桂策略。8月23日，蔣考慮應注意各項，「一、對桂決先以無條件撤兵，要求其實行。二、中央軍對桂之目的。（甲）藉此派兵入粵。（乙）使白離桂。三、對桂之處置，以不違背第二項之二大目的為要。四、對桂如不能澈底解決，則中央之統一對外與整理各省內外種種計畫俱不能貫徹。五、對桂以和平解決為根本之方針。」8月24日，「一、討桂佔領梧州後，交黃紹竑用政治途徑解決可乎。二、對桂用兵時，仍應隨時進行和平解決。三、佔領梧州後，即發和平宣言。」8月25日，「桂逆視我方退讓，而彼又有無理之要求，殊堪痛心。」8月27日，「考慮對桂政治解決方案，並實施政治解決方案以前應有之策略，須使其必取攻勢方可，否則彼負隅而掩蔽，拖延時日大有害矣。乃決定使其必取我攻勢之方案。（甲）用飛機破其交通與封鎖。（乙）用飛機散發傳單，令其不能忍耐。（丙）令湘與之勾結，做其援湘而擊之。（丁）整頓湘粵，使其來干涉而擊之。（戊）開國防會

<sup>143</sup> 《事略稿本》，1936年8月19日。

<sup>144</sup> 《事略稿本》，1936年8月22日。

<sup>145</sup>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45冊，頁137、143。

議用政治解決。(己)余本人暫對桂置之不理，以便沉機觀變。」8月29日，「對內要點如桂逆頑固，而我撤兵不討，則其將來發生如何結果，其利害之大小應澈底研究。……晡，考慮對桂應注意各項，一、撤兵之理由與手續。二、應否有條件撤兵。三、撤兵應否同時下處置廣西命令。四、廣西本身應如何處理善後。五、桂逆最後是否向外突竄。」<sup>146</sup>蔣在8月下旬召集相關人士，如居正、余漢謀、陳誠、熊式輝、程潛、朱培德等人頻繁會商對桂事宜。在會談中時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意見是主張戰爭以澈底解決桂事：

24日，蔣公詢余對桂事意見，余直言，粵桂諸將領皆犯有一種勇於私鬥怯於公戰之病。當此前門有日俄之虎，後門有朱毛之狼，依然忍心害理，反覆無常，作出為親者痛、仇者快之惡劇。不是中央處理之寬大，恐早潰裂不堪收拾，……今其勢窮力竭，尚圖負隅自固，似不宜太為將就，人思蔓草留根，我必除惡務盡，姑息養癰，必貽後患，即為愛惜一部份國力，必對方確能成為一部份國力，而不是又變為將來對外之牽制，方可以談和平了結，否則在押虎咒，宜為慎處，傳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當日朱毛之困處瑞金，我未能給予殲滅，致任流竄，遺憾難追，今粵桂內情，非所深悉，願公長慮而熟思之。25日，在黃埔召開軍事會議，余與何鍵、陳誠、余漢謀等均出席，確定對桂事採取和平方式求解決。<sup>147</sup>

熊式輝的主戰意見並沒有獲得採納。最後的結論是蔣決定對桂系以政治解決，此決定有很大的原因是由於察綏局勢不穩，日軍蠢蠢欲動。但是蔣的政治盤算是誘使桂系出兵，擊敗後再行談判，如此一方面可令桂系服從中央，另一方面中央退兵才有臺階可下，否則中央軍無端撤退，將使桂系氣焰更加高張。

為了加速解決桂局，蔣決以空軍轟炸廣西以迫使桂系出兵為戰略主軸。9月1日，蔣電周至柔，告以「意大利重轟炸機能否飛粵為對桂轟炸之用，又在粵之新到法國重機亦應趕裝使用，最重炸彈應悉解粵使用」。蔣同日考慮「炸桂之結果：(甲)屈服。(乙)衝出。(丙)閉拒談判而延時。炸桂之理由與手續及態度。」決定預定各項，「一、令長沙從速預備飛機炸彈，限於星期一完

<sup>146</sup> 《事略稿本》，1936年8月23、24、25、27、29日。

<sup>147</sup> 熊式輝著，《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年），頁193。

成。二、令查明桂北瞭望哨地點及飛行出入之路線。解決廣西決用空軍周旋而不用陸軍進攻，使其惱羞成怒出攻粵湘，則為我誘敵出擊之計，是乃求之不得者也，若其固拒延時，則我陸軍伸縮進退，皆可自由，無礙大局，是乃惟一之方略乎。」9月2日，蔣「又思桂局不用威脅尚難得和平解決，乃電南京航委會周主任至柔、南昌空軍毛指揮官邦初，告以（一）貯於南昌各種重量大炸彈，限本星期內運貯長沙。（二）南昌諾索爾機須即準備隨時候令向長沙出發，並制定對桂州轟炸之各種計畫及設備，其經過以避免桂林為要，並與貴陽空軍約定共同動作方案，來往電報皆應由重慶轉用有線電為要，對臨時出發之時間，不能不用無線電時，則可預約幾種代名詞，例如以位代時，凡地名時間皆應多約代名詞為要，統限本星期內準備完畢，又意大利轟炸機亦應準備使用，可否，希詳復。」<sup>148</sup> 蔣的空軍轟炸部署正加速進行，已有箭在弦上之勢。

在空軍準備之同時，蔣指派朱培德、程潛、居正飛邕進行和談。《大公報》報導，「9月2日居正一行人到邕，把蔣親筆函面交李、白，傳達中央和平意旨。三人2日晚與李、白開和平預備會，朱培德提出和解方案，會商歷三小時，李、白對辦法內容認為滿意，惟有數項條改，朱即晚電蔣請示，蔣特派唐星3日下午二時飛邕參加會議傳達意旨，請李白開誠協商，3日上午下午均開正式和會，尚無結果，李、白促蔡廷鍇返邕參加。」《冀東日報》：「據一般推測，桂局經此斡旋，和平有望，惟據另說，李、白對離桂一點，仍有相當堅持，和平解決，尚待疏解。」<sup>149</sup> 當時擬定和議方案如下：「一、重申解放抗日救國運動及言論、集會、結社自由；二、撤退南下各軍，恢復各方交通；三、確定抗日計劃及時期，務求在最短期間實現；四、李宗仁任廣西綏靖主任，並保留第四集團軍；五、白崇禧以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名義出國考察；六、廣西黨政人事一仍其舊；七、廣西軍隊確保三個軍，軍費由中央補助；以上各條除第三條保密外，餘均電蔣以談話方式宣示國人。」李、白將上面的方案交給三代表，居正等三人於4日下午返粵覆命，李、白並派劉斐隨行。<sup>150</sup> 《大公報》6日報導：「劉維章（斐）4日返粵，即謁蔣呈李、白致蔣親筆函，面述所提條

<sup>148</sup> 《事略稿本》，1936年9月1、2日。

<sup>149</sup>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45冊，頁156-157、161。

<sup>150</sup> 程思遠，《政海密辛》，頁93-94。

件，並表示桂方承諾中央和解原則，密談半小時始還。」<sup>151</sup> 5日上午8時，蔣召余漢謀、居正、程潛、朱培德、陳誠等在黃埔會議，對李、白要求討論三小時，由蔣親筆函復，交劉維章於6日飛桂復命。<sup>151</sup> 事略稿本記載：「公（蔣）對桂之解決，煞費心力，至此李、白表示服從，公心頗喜云。」5日，蔣召見朱培德、熊式輝研究桂事後，往訪程潛與劉斐，決定辦法，遂即下令撤兵。<sup>152</sup> 9月6日，國府明令如下：「一、軍事委員會常委李宗仁調任為桂綏靖主任；二、浙省府主席白崇禧調任為軍事委員會常委；三、桂綏靖主任黃紹竑調為浙省府主席。」<sup>153</sup> 李、白致電中央，表示願意接受新命，兩廣事變獲得解決。

9月7日，《大公報》的標題為「桂局急轉，和平告成」。<sup>154</sup> 可見桂局的解決，給人的印象便是局勢發展急轉直下，寧桂突告妥協。其實對蔣而言，事情的發展也出乎預料之外。自從8月22日因白崇禧拒絕下臺導致和談破裂後，觀察蔣的思考脈絡，如前所述其已決定以空軍轟炸廣西，刺激桂系出兵，中央軍取得有限度勝利再伺機談判，並以退兵為進行步驟。而蔣最不希望見到的是桂系負隅頑抗，中央軍必須與其僵持周旋，徒然消耗而無法應付國內外的挑戰。當9月2日中央三代表至邕重啟談判時，蔣對其並不抱著多大的希望，可是令人意外的是白崇禧下臺問題經會談後卻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白願意離桂出洋，原先的和談障礙獲得解決，故局勢終告緩和，和議遂成。但此發展讓人不禁想問，為何8月中下旬的會談桂系堅持白氏必須留在廣西，而到了9月初卻同意其改調南京？這可能有兩個原因。首先南京對廣西的封鎖奏效。廣西在中央軍的封鎖之下，除了之前所述鴉片過境稅的收入大減之外，連食糧、鹽的獲得都感困難。廣西本身商業蕭條，有關軍事物資已由當局統制買賣，如汽油已被檢查收買一空，糧食一律禁止運輸出口。<sup>155</sup> 財政與經濟狀況的惡化，恐

<sup>151</sup>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45冊，頁163。

<sup>152</sup> 《事略稿本》，1936年9月4-5日。

<sup>153</sup>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45冊，頁166。

<sup>154</sup>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45冊，頁166。

<sup>155</sup>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45冊，頁149、157。

怕是廣西當局必須妥協的關鍵因素。<sup>156</sup> 其次，中央的善意表示。其中最重要者為桂邊之中央軍在9月初奉令移撤若干里，又發表撤銷李濟深、陳銘樞通緝之令。<sup>157</sup>《大公報》社評認為「吾人滿腔贊同，蓋此為表示中央和平之決心故也」<sup>158</sup>，並稱「大凡解決政爭，最要在推誠相與，而人與人之感情乖離，則多由誤會累積而成。」<sup>159</sup> 故在中央釋出善意，加上三代表努力斡旋之下，李、白認為受到中央的尊重，因而願意讓步，和談遂告成功。9月17日下午，李宗仁、黃旭初由桂乘機到粵，蔣喜曰：

德鄰（李宗仁）此次來粵，一般人士必相慶，以為此係民國成立以來最重大及最愉快事件之一，因廣西為最後歸附中央政府之省份，李氏之來粵，可表示全國之整個統一也，今全國已整個統一抵禦外侮。<sup>160</sup>

對於兩廣事變的解決，9月底蔣在反省錄的感想為：

對桂白決主寬容和平解決，以白先離桂就範，則此次目的已達，其他枝節當無問題，故自程潛、居正回粵報命，乃即無條件先撤西江軍隊，以對桂之政治經濟，此時皆無用兵之必要也，況且對內作戰本身各省之弱點甚多，一經發動則必至不易收拾，乃左右幕僚祇知桂方之弱點，而不知我本身之弱點尤多，余之決然獨自決定對桂和平，此實黨國轉危為安之唯一關鍵，故國人皆頌贊余能忍耐與推誠之所致也，而余小子其益自加勉以期無負眾望焉。……人謂廣西未得澈底解決，將來必貽禍根，而白之在桂勢力未除，尤為可慮，以余之見，祇要廣東穩固則廣西不足為患，而且粵黔禁煙實施，彼之

<sup>156</sup> 朱浚源也認為兩廣事變中，廣西省之所以一反往昔，轉與蔣合作，共赴抗日，主要原因之一是蔣禁絕鴉片通過桂省，使桂省因稅收頓減，不得不儘速與蔣妥協。見朱浚源，《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1860-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頁268。

<sup>157</sup> 李濟深、陳銘樞因參與閩變由南京下令通緝。

<sup>158</sup> 〈收拾桂局之最後希望〉，《國聞週報》，第13卷第35期（民國25年8月25日至9月1日），〈論評選輯〉，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5輯，總頁2378。

<sup>159</sup> 〈廣西問題圓滿解決〉，第13卷第36期（民國25年9月2日至9月9日），〈論評選輯〉，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5輯，總頁2381。

<sup>160</sup> 《事略稿本》，1936年9月17日。

財政收入大減半數，若再由中央補助其經費，則其依賴中央之心不可一日脫離，雖有白非絕對聽命，中央則無能為力矣，以此知廣西之不足慮，不惟不足慮，且余對外作戰時，兩廣必可為有力之幹部也。<sup>161</sup>

由此可見，對蔣而言，只要控制好廣東並使廣西財政依賴中央，藉由經費補助問題加以箝制，桂系已不足為患，南京中央的「統一化」目標已更進一步。

## 伍、結 論

蔣中正在五全大會後開始嚴肅思考如何統一廣東，尤其粵漢鐵路即將接通，這對中央勢力進入廣東提供莫大的便利。而胡漢民突然因腦溢血去世，使得兩廣失去政治上的掩護，進而與中央的關係產生了重大變化。蔣趁機向廣東提出加強團結的要求，並準備用政治手段改組廣東軍政。陳濟棠認為與其坐以待亡，不如和桂系一起反蔣，而為了爭取輿論的支持，兩廣以「抗日」為號召。粵桂派遣代表聯絡湖南何鍵，提供湖南財政援助，以換取何鍵對粵桂軍的支持。粵桂軍在完成軍事準備後，西南兩機關發表「冬電」「支電」，聲稱兩廣所部將北上抗日，於是「兩廣事變」正式爆發。為了弭平兩廣事變，蔣的對策主要是雙管齊下，一面宣布召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另一方面迅速調集兵力，搶占戰略要地。尤其衡陽是寧粵雙方兵家必爭之地，蔣中正指派陳誠到湖南布置軍事，搶先派兵進入衡陽，並成功勸說何鍵支持中央。兩廣在受此打擊之下，聲勢一蹶不振。之後甚至廣東空軍投奔中央，粵系將領李漢魂、余漢謀紛紛倒戈支持南京，這情勢使得陳濟棠被迫下野，結束了南天王五年治粵生涯。

蔣的態度是既然廣東局勢已在掌握之中，對廣西就可暫時放鬆，給予財政補助，使其配合中央決策。蔣在陳濟棠下臺，廣州局勢混沌不明之時，首要工作希望余漢謀儘快帶兵進入廣州，掌握廣東局勢，至於對桂系的態度還是維持二中全會的決議，委以原來的職務。不過如果廣西可以歸順中央，對蔣而言當然更好。此時廣西已經準備和中央妥協，而且蔣也收到相關電文和情報，兩

<sup>161</sup> 《事略稿本》，1936年10月1日。

廣事變似乎將告一段落。

但是蔣的對桂態度突然有了大幅度的轉變。蔣有意在控制廣東之後，將李、白調離廣西，趁機解決廣西半獨立的態勢。而蔣對桂突採嚴峻的態度，其原因除了可能是楊永泰的建議外，原來新任廣東綏靖主任余漢謀非蔣嫡系將領，其初入廣東即有拒中央軍入粵之意，蔣恐余漢謀掌握廣東後成為陳濟棠第二，重現地方割據，因此以對付廣西為藉口，派兵進入廣東，以圖控制廣東政局。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原來對蔣就不太信任，猜想蔣會採取強硬手段。這時看到要把他們調離，更加肯定蔣要掌握廣西。李、白堅定繼續堅持抗日反蔣的決心。李、白調職令發布之後，寧桂雙方開始進行一進串的軍事部署。輿論的看法是李、白以「抗日」為號召，已失去其正當性，應服從中央號令，而南京應以和平統一的方式解決廣西問題。

蔣以包圍桂系為名派兵入粵達成初步控制後，對廣西的態度有放鬆的跡象。雖然對蔣而言最好的結果是迫使李、白離桂，澈底控制廣西，但是桂系的態度相當頑強，不輕易向中央屈服。因此蔣如要貫徹意志，恐不免與桂系一戰，如此雖可達成目標，南京也會付出沈重的代價。蔣決定稍退一步，同意李宗仁繼續主桂，而白崇禧離開廣西，如此可讓寧桂雙方都有臺階可下。從李、白的角度來思考，其立場當然是拒絕南京所下的調職令，力圖繼續留在廣西掌權。但是李、白的處境實在困難，面臨著內憂外患的挑戰。外有南京的軍隊包圍，而內部的主要是經濟財政不斷惡化，尤其為了擴充軍隊大行徵兵，使原來經濟狀況更是雪上加霜。因此，當南京有意展開和平談判時，廣西在內外壓力下決與中央談判，於是寧桂雙方展開和平談判的努力。不過桂系在連日召開會議後，最終決定拒絕和談條件並堅持和南京對抗，其中最主要因素為白崇禧決定拒絕離開廣西。

蔣在和談破裂後仍決定對桂系以政治解決，此決定有很大的原因是由於察綏局勢不穩，日軍蠢蠢欲動。蔣此時的盤算是誘使桂系出兵，將其擊敗後再行談判，如此一方面可令桂系服從中央，另一方面中央撤兵才有臺階可下，否則中央軍無端撤退，將使桂系氣焰更加高張。蔣預定以空軍轟炸廣西，刺激桂系出兵，中央軍取得有限度勝利再伺機談判，並以退兵為既定步驟。此外並指派中央三代表至邕重啟談判，蔣原本對其並不抱著多大的希望，可是令人意外

的是白崇禧下臺問題經會談後卻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白願意離桂出洋，原先的和談障礙獲得解決，故局勢終告緩和，和議遂成。財政與經濟狀況的惡化，恐怕是廣西當局必須妥協的關鍵因素。兩廣事變最終和平落幕，對蔣而言，代表其統治手腕更加成熟，並可博得和平寬大之美名。<sup>162</sup>

---

<sup>162</sup> 馮玉祥 1936 年 9 月 23 日記載：「而今事情要結束了，罵幾句沒什麼關係，我們只有和平寬大為最好。蔣說：很對，很是，我們就這樣辦為好，為國家計，為人民計，均實在堪敬佩之事也，均實在堪慶幸之事也。說起話來很容易，作起來實不容易，能這樣作起來，國事如何不好呢？有人說：蔣早日如此不好了嗎？我說不晚。」由此可見時人對蔣印象已大為改觀，認為蔣能以國內和平為念，不輕易動武，實屬相當大的進步。見馮玉祥，《馮玉祥日記》，第 4 冊，頁 781。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彙編

《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文物圖書〉，事略稿本，民國 25 年。

〈革命文獻〉，第 28 冊——兩廣事變。

〈特交文卷〉，親批文件，民國 25 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年。

林忠佳等編，《申報廣東資料選輯》。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96 年。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 45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年。

國聞週報社輯，《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 年。

國聞週報社輯，《論評選輯》。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5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 年。

雲南省檔案館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雲南部份）》。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 年。

### 二、日記、文集、自傳、回憶錄、口述歷史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十年內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南天歲月——陳濟棠主粵時期見聞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 年。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臺北：國史館，2005 年。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東南印務

出版社承印，國史館藏。

陳誠口述，柳克述筆記，〈兩廣六一事變處理經過〉，《傳記文學》，第53卷第3期（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88年）。

陳誠著，何智霖、高明芳、周美華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臺北：國史館，2006年。

程思遠，《政海密辛》。香港：南粵出版社，1988年。

熊式輝著，《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年。

黃紹竑，〈我與蔣介石和桂系的關係〉，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7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62年。

黃紹竑，〈新桂系與鴉片烟〉，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34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

劉斐，〈兩廣六一事變〉，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

### 三、專書

Lary, Diana,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申曉雲、李靜之著，《李宗仁的一生》。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朱法源，《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1860-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從九一八至七七》。臺北：國史館，2000年。

施家順，《兩廣事變之研究》。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年。

施家順，《陳濟棠與廣東軍政（1928-1936）》。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年。

程思遠，《白崇禧傳》。臺北：曉園出版社，1989年。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史館，1995年6月。

蕭自力，《陳濟棠》。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 年。

#### 四、期刊、論文

王宏松，〈蔣中正與粵系二陳（陳銘樞、陳濟棠）關係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呂芳上，〈領導者心路歷程的探索：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收入《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 年。

徐江虹，〈新桂系與兩廣事變〉，收入《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4 年第 5 期。

陳存恭，〈從「兩廣事變」的和平解決探討「安內攘外」政策〉，《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年。

楊維真，〈剿共與統一——論 1935 年中央改組貴州省政府事件〉。臺北：辛亥革命九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2001 年。

